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13期（民國110年9月），77-13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關鍵環節：第一次緬甸戰役中的林蔚及其參謀團*

蘇聖雄**

摘　要

關於1942年的第一次緬甸戰役，學界研究成果十分豐碩，可見所受之重視。當中史實論述，多會提到林蔚及其參謀團，惟深入的學術研究，可說尚未展開。實際上，林蔚駐臘戍的參謀團，與駐梅苗的英軍司令部，以及駐瓢背的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部，三個高級軍事單位鼎足而立，皆扮演一定角色。是役為國軍首度遠出國門作戰，戰地遙遠、通訊不便，統帥部特設參謀團以監督遠征軍作戰，其主要工作，一為指導，一為聯繫。考察參謀團的作為，可見其係第一次緬甸戰役國軍的重要組成環節，它的組織與運行，具體展現了蔣中正的指揮統御，以及國軍參謀制度的發展、特色與侷限。

關鍵詞：林蔚、蔣中正、史迪威、滇緬參謀團、中國遠征軍

*　收稿日期：2020年7月6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年3月26日。
本文曾發表於臺北、北京的研討會或演講活動，承蒙劉維開、林桶法、黃自進、王奇生、羅敏、李在全、李志毓等諸位學者的指教，投稿過程復蒙編輯委員會及二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前　言

中日戰爭期間，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1887-1975）爲全面掌握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府）的人事狀況，於委員長侍從室成立人事處，全面調查黨政軍人員。[1]該處一份調查報告，提到軍令部中將次長林蔚（1889-1955）：「學識淵博，思想極週密、有系統，乃一極可靠有爲之幕僚長」，「作事虛心縝密，歷年來參與戎機，獻替極多，爲上下所欽敬」。[2]該報告給林蔚高度評價，予其等第「甲」，並提及其最近之工作爲「主持西南戰局，繼赴緬甸考察」，「於去年〔1941〕十一月調兼滇緬參謀團團長駐臘戍部署作戰計劃，並代理指揮部隊」。[3]

這位受到人事報告高度評價的林蔚，自北伐以來追隨蔣中正，於國軍確有其地位。1943 年 2 月 4 日除夕，蔣中正以親人皆不在身邊，感到「孤身獨影，蕭條寂寞極矣」，最後便約林蔚「來共餐解寂也」。[4]曾任林蔚下屬的於達（1893-1985）認爲，林蔚和陳布雷（1890-1948）一樣皆爲忠臣，從不爲自己打算，凡事都爲委員長打算。[5]林蔚 1955 年 8 月過世後，報載林蔚就像三國時代的諸葛亮，所有案書簿籍事必躬親，夜以繼日地工作，甚至將死於五丈原，還不肯將軍中政事委諸部屬。[6]

1　馮啓宏，〈花谿論英雄：侍從室第三處的人事工作析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7（2007 年 9 月），頁 119-164。

2　該報告侍從室第三處第八組收到時間爲 1943 年 12 月 22 日，依內容判斷，應於 1942 年作成。〈林蔚調查報告〉，國史館藏（下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入藏登錄號 129000098222A，「林蔚」。

3　〈林蔚調查報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入藏登錄號 129000098222A，「林蔚」。

4　〈蔣中正日記〉，1943 年 2 月 4 日，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下略）。

5　張朋園、林泉、張俊宏訪問紀錄，《於達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頁 116。

6　〈剪報資料：國防部不能一日無林蔚（1955 年 8 月 10 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入藏登錄號 129000098222A，「林蔚」。相似的評價，可參見林故上將治喪委員會編，《林故上將蔚文先生榮哀錄》（臺北：編者自印，1955）。

雖然林蔚對蔣中正而言有其重要性，惟一般談論蔣之親近部屬卻不常提及，文官爲人所知者如楊永泰（1880-1936）、陳布雷、張羣（1889-1990），武將則有何應欽（1890-1987）、張治中（1890-1969），或是方面大員陳誠（1898-1965）、湯恩伯（1899-1954）、胡宗南（1896-1962）等人。林蔚何以不在其列？究其緣故，或因林蔚長期擔任參謀或副手，作爲難以彰顯。但若換一角度思考，於此隱而難見之處，考察林蔚的參謀工作，或可提供認識國軍組織與作戰的不同視角，以及蔣中正領導統御的另一側面。

如侍從室報告所言，1941 年林蔚以軍令部次長之職，兼桂林辦公廳副主任，同時出任軍事委員會參謀團團長，調查雲南地勢，擬訂作戰計畫，加強雲南邊境國防工事。年底，珍珠港事變爆發，美、英等西方列強隨即與抗戰逾四個年頭的中國結成軍事同盟，林蔚以參謀團團長身分，就近部署、指導中國遠征軍出兵緬甸，其與參謀團在 1942 年第一次緬甸戰役的作爲，正可提供考察的切入點。

關於第一次緬甸戰役，學界研究成果十分豐碩，可見所受之重視。當中的史實論述，多會提到林蔚及參謀團，惟深入的學術研究，可說尚未展開。考諸西方現代軍事史，自列強軍隊參謀制度建立以來，參謀在部隊即佔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1914-1918），參謀部成爲德國軍事編制中最主要的部分。參謀軍官即便階級較低，仍具有相當權限，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馬恩河之役（First Battle of the Marne, 1914）末期，參謀總長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Younger, 1848-1916）派到現地的參謀官亨遲中校（Friedrich Heinrich Richard Hentsch, 1869-1918），穿梭前線調查狀況後，不顧一些現地將領的反對，獨斷做出撤退的命令。[7]過去述論緬甸戰役的過程與成敗，多聚焦於蔣中正、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 1883-1946）或前線指揮官。實際上，林蔚駐

7 James Donald Hittle, *The Military Staff: It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Harrisburg, Pa.: Military Service Division, The Stackpole Co., 1961), pp. 80-81; Holger H. Herwig, *The Marne, 1914: The Opening of World War I and the Battl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9). p. 283.

臘戍的參謀團，與駐梅苗的英軍司令部，以及駐瓢背的史迪威（和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部）三個高級軍事單位鼎足而立，皆扮演一定角色。

本文以此爲題進行梳理，探討參謀團的淵源爲何？蔣中正何以派林蔚出任參謀團團長？參謀團在指揮體系中扮演何種角色？林蔚與其參謀團在戰役中的作用爲何？影響爲何？第一次緬甸戰役論著甚夥，本文嘗試從林蔚及其參謀團的角度，重新思索相關問題。

本文利用之史料，包括中、英、日文檔案與圖書，其中最重要者有三。一爲《蔣中正總統文物》中戰役期間蔣、林大量往來電文與信函；二爲林蔚的日記；三爲林蔚於戰役結束後的檢討報告書。第一、二種檔案史料典藏於國史館，惟後者僅存 1941 年。[8]第三種於國史館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皆有收藏，[9]已有學者用以論述緬甸戰役的過程或是將領的指揮；[10]其實，該報告內容圍繞林蔚領導之參謀團，適爲論述第一次緬甸戰役中參謀團作爲的關鍵史料。[11]

8　〈林蔚文抗戰日記節錄（民國三十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 008-010701-00001-001~008-010701-00001-012，「林蔚文抗戰日記節錄」。以下引用簡稱〈林蔚日記〉，不著典藏號。利用該日記較新的研究，如藤井元博利用林蔚日記與相關檔案，探討重慶政府派兵緬甸從構想到實施的過程，惟該文主旨並非聚焦於林蔚與參謀團。參見藤井元博，〈中国国民政府の対日戦略と軍事作戦 ── 1942 年のビルマ戦を事例として〉，《戦史研究年報》，号 22（2019 年 3 月），頁 1-29。

9　報告書共三冊。藏於國史館者屬《國民政府》全宗，件名〈緬甸戰役作戰經過及失敗原因與各部優劣評判報告書〉，卷名「緬甸戰役得失評判」，典藏號爲 001-072620-00001-001、001-072620-00002-001、001-072620-00003-001、001-072620-00004-001，以下引用本報告，依序簡稱《林蔚報告書第一冊》、《林蔚報告書第二冊（一）》、《林蔚報告書第二冊（二）》、《林蔚報告書第三冊》。

10　舉要如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介石、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頁 99-130；Hans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New York, N.Y.: RoutledgeCurzon, 2003), p. 29;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頁 92、96、101。

11　近來相關史料已整理出版：林蔚原著，蘇聖雄主編，《林蔚文抗戰遠征日記（1941）》、《林蔚文抗戰遠征日記（1942）》（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前者爲林蔚 1941 年日記，後者爲林蔚 1942 年編撰之緬甸戰役檢討報告書，由於內容爲陣中日記形式，故書名亦以日記稱之。兩書係打字出版，本文爲直接徵引原始史料，逕引原檔，未著該書。

二、參謀團的淵源

林蔚，字蔚文，浙江黃巖人，畢業於江南陸師學堂、陸軍大學。早年於浙軍擔任師參謀長，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投入國府陣營。北伐結束後，跟隨蔣中正歷任諸多參謀要職，如軍事委員會（以下或簡稱軍委會）辦公廳副主任、軍委會銓敘廳廳長等。1937 年七七事變爆發，林被派往華北任行營參謀長、第一戰區參謀長。1938 年初回到中央任軍令部次長，旋兼侍從室第一處主任。1938 年底再度外放，赴中國西南擔任桂林行營參謀長，1940 年中旬桂林行營縮編後，改任桂林辦公廳副主任。1941 年底出任參謀團主任。[12]

林蔚主持的參謀團全稱「軍事委員會駐滇參謀團」，於 1941 年 11 月建立，1942 年初隨遠征軍入緬，改稱「軍事委員會滇緬參謀團」。[13]這個參謀團的淵源有二，一爲國軍的聯絡官制度，一爲 1941 年初的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林蔚與兩種淵源皆有一定關係。以下首先述論國軍的聯絡官制度，次則敷陳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

（一）國軍的聯絡官制度

參謀團這樣的臨時編組，可追溯至現代參謀制度中的聯絡官（liaison officer）。初始聯絡官的任務主要在基層軍事戰術層面，協助上級司令部與下級之聯繫；上級司令部派遣一個中級軍官參謀下去，可以指導前方的高級司令部，如是部隊上下聯絡密切，運用靈活，猶如一體，作戰易於取勝。[14]

---

12 〈林蔚人事調查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入藏登錄號 129000098222A，「林蔚」。

13 「軍事委員會滇緬參謀團」英文名稱爲“General Staff Mission to Burma, the 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參考自林蔚的信箋，〈林蔚致蔣中正函〉（1942 年 4 月 24 日），國史館藏（下略），《蔣中正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20-014，「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二）」；沈定，〈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抗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遠征印緬抗戰》編審組編（下略），《遠征印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頁 153。

14 陸軍大學譯，《美國參謀業務》（出版地不詳：軍令部第三廳，1939），頁 147-188；蔣中正，〈宣讀「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訓詞第三冊」後講解〉（1941 年 10 月 17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

隨著世界大戰戰爭規模的擴大，現代聯絡官制度不斷演變，任務益趨複雜，層次拉高到政治外交層面，於各國聯合作戰之中，主要任務在獲得盟國理解、避免衝突與建立信任。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法英同盟，其聯絡官便有兩個層次的工作，一爲政治外交上，另一爲軍事層面；[15]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盟軍藉各式各樣的參謀團（military missions）提升盟國間的聯絡效率，雖未以聯絡（liaison）爲名，實質上進行高層次的聯絡官工作，這個制度一直延續到戰後。[16]

蔣中正十分重視聯絡官的作用，於中日戰爭前曾對剿共部隊的聯絡官訓話，表示聯絡參謀由高級總司令部派任，代表高級總司令部的精神與人格，用以明瞭各部隊作戰的情況，以隨時有效的報告做總司令的耳目，並且轉達命令，樹立總司令的威信。[17]蔣強調剿共軍事所以遷延日久，就是因爲前方部隊沒有人隨時檢查督率，聯絡參謀便負有調查的責任，上級總司令部賴以作出賞罰。[18]出於對聯絡官的重視，蔣並曾於 1943 年 9 月親派其子蔣緯國（1906-1997）擔任駐印軍鄭洞國（1903-1991）部的聯絡參謀，既充填重要職位，也讓其子有機會於職務上歷練。[19]

（下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卷 18，頁 376-377。

15 Elizabeth Greenhalgh, *Victory through Coalition: Britain and France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75-77.

16 Peter Williams, "The Changing Face of Military Liaison,"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 (PHP),* http://www.php.isn.ethz.ch/lory1.ethz.ch/collections/coll_brixmis/military_liaisonf287. html?navinfo=2775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British Army Review*, Autumn 2003; accessed May 15, 2020); Thomas S. Lough, "The Military Liaison Missions in Germany,"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1:2 (June 1967), pp. 258-261.

17 蔣中正，〈聯絡參謀的責任和意義〉（1932 年 7 月 9 日），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0，頁 627-636。

18 高明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05），冊 18，頁 424-436。

19 〈蔣中正致鄭洞國轉蔣緯國電〉（1943 年 9 月 24 日），《蔣檔》，典藏號 002-070200-00019-017，「交擬稿件 ——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至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基層聯絡官制度在國軍的發展，可參見葉銘，〈業務紐帶：淺析抗戰時期聯絡參謀與參謀視察制度〉，《民國檔案》，2020 年第 2 期，頁 106-115。

中日戰爭爆發後次年，基層聯絡官制度法制化。軍令部訂定〈軍令部聯絡參謀派遣規則〉，其立法目的在「爲求作戰指導適切，及溝通最高統帥部與各部隊之意志」；聯絡參謀任務在適時傳達最高統帥部之意旨及全般戰況，隨時將前方戰況及各部隊現狀報告軍令部，並對軍令部及所在部隊長貢獻作戰意見。[20]

若聯絡官派出者眾，形成一個高階將領領導的團隊，這樣的聯絡參謀團隊或稱作「參謀團」。[21]其例可見諸 1934 年爲協助四川剿共，以賀國光（1885-1965）爲主任之軍委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該參謀團駐重慶，業務範圍廣泛，包括川、滇、黔、康的政治、軍事、經濟，國府中央權力藉以延伸至四川。[22]由於國府所能掌控的省分以東南沿海爲主，中國各地仍分布大小軍系，因此與地方聯繫或將中央勢力打入地方，爲國府重要課題，參謀團便是因應這個任務而產生，除了軍事指導，亦含政治作用，可說是一種高層次的聯絡官制度。[23]

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爲調動地方軍系配合中央抗戰，聯繫地方的任務依然迫切。1938 年徐州會戰期間，蔣中正將部分中央作戰部門高層人員留在徐州，組織「臨時參謀團」，協助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1891-1969）之作戰，其成員有副參謀總長白崇禧（1893-1966）、軍令部第一廳廳長劉斐（1898-1983）等人，軍令部次長林蔚亦包括在內。林蔚與參謀團成員，除指導前線作戰，每日並向軍令部長徐永昌彙報前線戰情，協助第五戰區獲致台兒莊之勝

20 〈軍令部聯絡參謀派遣規則〉（1938 年 7 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下略），《軍令部》，檔號七六九-2441。

21 國府建立之初，已有參謀團的組織，不過初始並非參謀人員的派出組織，而是高級軍事機構下的參謀單位。蘇聖雄，《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 —— 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臺北：元華文創公司，2018），頁 30-31。參謀團在國軍另外指涉參謀人員組成的高素質群體，此係仿德國參謀制度而建立，與本文脈絡不同。〈工作報告〉（1942 年 10 月至 1943 年 10 月），《軍令部》，檔號七六九-2481。

22 賀國光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大事記》（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37），上冊，頁 268-275；下冊，頁 1013。

23 另外，民國有所謂「溝通型幕僚」，在各軍系奔走協調，合縱連橫，賀國光在四川便有「溝通型幕僚」的性質，不過本文參謀團的脈絡，偏向軍事作戰方面，與「溝通型幕僚」仍有不同。張瑞德，〈化干戈爲玉帛：溝通型幕僚與民國政治〉，《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 40（2008 年 12 月），頁 85-100。

利。爾後日軍捲土重來，向徐州大舉進攻，軍委會再次組成臨時參謀團，由林蔚、劉斐領銜駐徐，督促前線貫徹蔣中正的命令。[24]

徐州會戰的參謀團在國軍高層次聯絡官制度發展史上頗具代表性，其作用一爲使中央負責作戰的軍令部得以有效掌握前線作戰的進行；二爲協調中央與地方軍系，具政治意義。前者可見諸參謀團多數成員爲軍令部高層，以中央大員坐鎮前方指導全局；後者可見諸其成員之白崇禧或劉斐，與李宗仁皆屬桂系，可藉地緣軍系關係加強聯繫。如此模式延續下來，1939 年軍委會委員長天水行營主任程潛曾主動提議成立「委員長天水行營參謀團」，宗旨爲「溝通行營與戰區間之意旨，使作戰指導能適時機，事無鉅細，均切實際」。[25]後來林蔚的滇緬參謀團，亦可說承襲此一精神。

（二）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

林蔚的滇緬參謀團有上述國軍時間較長的參謀官制度淵源，至於人事與業務上，則與時間較短的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相關聯。

先是，1940 年 9 月日軍進駐法國殖民地北印度支那，威迫國府西南省分，而英國亦同受日軍對其東南亞殖民地的可能威脅，自 1940 年 10 月起開放封鎖三個月的滇緬公路，與國府溝通合作。[26]蔣中正企望藉此機會簽訂中英軍事同盟，英方認定這個提案並不實際，不過爲了增進彼此的軍事合作，仍派遣丹尼斯少將（Lancelot E. Dennys）擔任聯絡官赴中國聯繫協調（英國內部稱作“204 Mission”）。中方則於 1941 年 1 月間組成「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藉由實地考察英國東南亞屬地籌謀可能的共同防禦方案。[27]

24　蘇聖雄，《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頁 165、185。

25　〈程潛致蔣中正電〉（1939 年 6 月 17 日），《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516-115，「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八十九）」。

26　Peter Lowe, *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pp. 173-175, 208-231；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東京：原書房，1996），頁 33-34。

27　Sir A. Clark Kerr to Mr. Eden, 20 January 1941, General Review by Sir Arthur Blackburn of Political Events in China during 1940, Foreign Office (F.O.),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Kingdom, 371/27717 [F3782/3782/10]; China: Assistance to China: Military Mission to Chungking, China,

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團長商震，時爲軍委會辦公廳代主任；副團長林蔚時爲軍委會桂林辦公廳副主任，正結束廣西南寧、欽縣間的戰史旅行返回桂林。[28]其他考察團團員包括軍委會、陸海空軍人員及外交人員，共計 14 人。（表 1）

表 1　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成員

單位職務		姓　名
團　長	軍委會辦公廳代主任	商　震
副團長	軍委會桂林辦公廳副主任	林　蔚
團秘書	鹽務總局人員	劉耀漢
	第五軍軍長	杜聿明
	第五軍參謀長	侯　騰
	軍令部高級參謀	馮　衍
	軍令部參謀	劉方矩
	軍委會辦公廳副官	劉憪昌
	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參謀	唐保黃
	陸軍大學兵學教官	陳左武
	航空委員會參謀處科長	王可贊
	後方勤務部人員	林　湘
	海軍司令部人員	周應聰
	外交部人員	鄭康祺

資料來源：劉憪昌，〈中國軍事考察團赴緬、印、馬考察概況〉，《貴州省黔西南州文史資料選輯》，輯5（1985年9月），頁11；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收入《遠征印緬抗戰》，頁8；〈名單〉，國史館藏，《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35100-00007-009，「出國人員勛獎」。

Under Maj-Gen L E Dennys Preparation of Mission (204 Military Mission) and Base Organisation in Burma Supply and Personnel, December 21, 1940 - February 26, 1943, Burma Office Records, British Library, Manuscript Number: IOR/M/3/1020；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收入《遠征印緬抗戰》，頁 1、8。

28 〈張發奎日記〉，1940 年 1 月 1-2 日，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藏。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是戰史旅行成員之一。

考察團英文名稱爲“Chinese Military Mission”，於 1941 年 2 月 10 日出發，先乘飛機赴昆明考察滇緬路運輸情形，爾後循陸路進入緬境。18 日抵達緬甸臘戍，接著乘火車經曼德勒（瓦城），20 日抵達仰光。[29]考察團一行在仰光會晤緬甸總督克格林（Archibald Douglas Cochrane）、[30]英緬軍總司令麥克萊（Kenneth McLeod）等，商談中英協同作戰方案、滇緬路運輸管理辦法等，爾後分四組至緬甸各地視察。[31]調查當地地形、交通，判讀開戰後具戰略價值之地點，以及日軍可能之進攻路線，並進行宣慰僑胞等工作。[32]3 月 15 日，各組考察完畢返回仰光，與英緬軍總司令等續談敵情、敵軍侵緬路線、中方可能協助之程度、中緬對空情報之聯絡及平時軍事情報之交換等。[33]

考察緬甸過程，林蔚已注意到英軍在緬軍隊數量甚少，素質複雜，裝備平常，甚至不及國軍。對英國來說，雖遠東危機日漸緊迫，但歐洲、非洲方面亦甚緊張，林判斷英國勢不能兼顧遠東，難以增加兵力、擴充部隊，英軍「中心想望友軍之援助，亦勢所必至」。至於開戰後英軍防衛之兵力，林蔚依現狀推測，至多不過三個師團。[34]

考察團接著離開緬甸，赴印度、馬來亞、新加坡，會見軍政要員，參觀駐軍訓練，考察軍港及海岸防禦設施，諸項行程皆獲英方的歡迎與禮遇。[35]返程由新加坡乘輪船赴仰光，再從仰光經臘戍返國，途中與緬甸總督會面，並持續視察返程路途各地。[36]

---

29 〈林蔚日記〉，1941 年 2 月 10-20 日。

30 1941 年 5 月，緬督易爲多曼史密斯（Reginald Dorman-Smith）。

31 Governor of Burma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Burma, 27 February 1941, F.O. 371/27611 [F1404/29/10]；〈商震林蔚致蔣中正報告〉（1941 年 2 月 21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06-041，「革命文獻──抗戰方略：後方部署」。

32 Governor of Burma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Burma, 24 March 1941, F.O. 371/27611 [F2276/29/10]; 〈商震致蔣中正報告〉（1941 年 3 月 12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06-043，「革命文獻──抗戰方略：後方部署」。

33 〈商震致蔣中正報告〉（1941 年 3 月 20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06-044，「革命文獻──抗戰方略：後方部署」。

34 〈林蔚日記〉，1941 年 2 月 28 日。

35 由於本文主軸在緬甸，考察團在緬甸外的參訪細節不詳述。

36 葉惠芬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10），冊 46，頁 329-330。

考察團三個月的行程，蒐集有關緬甸、印度、馬來亞的經濟、政治、軍事資料，編成《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報告書》，計三十餘萬言，其中最主要者，爲中、英、緬甸共同防禦計畫草案。[37]考察團部分成員後來進入新成立的參謀團之中，尤其是林蔚，他實地勘察的緬甸兵要、英軍情報，與英方直接接觸的經驗與觀察，以及參與擬定的作戰計畫，成爲後來參謀團運行的基礎。

三、參謀團的建立及其主要任務

林蔚考察歸國返回桂林寓所，短暫主持桂林辦公廳業務後，1941 年 7 月奉蔣中正電召至重慶。林蔚本就兼任軍令部次長，只是長期在西南工作，此時蔣飭令他回任，林數次以才力淺薄及返家侍母爲由請辭，皆未獲准，遂駐重慶軍令部辦公。[38]

林蔚在重慶，連日參加軍事會報、與英國武官商談、指導中英軍事會談、出席官邸會報。時中英雙方就日軍南進後、英日開戰之際，中英兩軍之行動進行商談，林蔚親自出席數次會議。[39]

中英軍事會談後來改稱「中英聯合軍事行動談話」（Discussion of Joint Sino-British Action），討論英日開戰後中英雙方的聯合行動。林蔚對英國並無信心，認爲英國之方針係利用友軍，盡量讓友軍對敵犧牲，自己則絕不孤注決戰，英方並且賣弄其資力，高唱全力幫助友邦協力對敵，而實際所助者甚少，故「與英國交涉軍事合作，徒勞無益」。[40]

---

37 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收入《遠征印緬抗戰》，頁 8。

38 〈林蔚致蔣中正函〉（1941 年 8 月），《蔣檔》，典藏號 002-080102-00018-007，「中央軍事機關人事（二）」；〈林蔚日記〉，1941 年 7 月 22-31 日、8 月 6 日、9 月 3 日；〈黃旭初日記〉，1941 年 7 月 11、13、15 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藏。

39 〈商震林蔚等與戴尼斯等四次談話紀錄〉（1941 年 7-8 月），《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40-005，「革命文獻——對英外交：一般交涉（二）」；〈林蔚日記〉，1941 年 7 月 20-31 日、8 月 6 日、9 月 3 日。

40 〈林蔚日記〉，1941 年 8 月 11-13 日。

林蔚的推斷沒有錯誤。考察團緬甸行之後，已擬訂防禦草案初稿，經過部分修改、補充與英軍商討，正式提出「中、英、緬甸共同防禦意見書」。英國態度一向消極，以時機未到爲由，不實施也不否決中國提出的意見。[41]在一次中英談話會上，林蔚指出日軍若進攻滇緬路，即爲中英聯合軍事行動的開始，英國代表丹尼斯少將否定這個說法，明白表示英國不會出兵，「防守昆明乃貴國自己之問題」。[42]其實，英國的戰略是對日避戰，保持與美國同一陣線，然後維持中國繼續抗戰，所以對中方態度始終曖昧。[43]

（一）駐滇參謀團的建立與備戰

中英共同防禦雖未實施，備戰仍在進行，英軍提供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援助與訓練。[44]中國方面，隨著日軍南進動向顯明，有可能爲解除南進時之中國威脅而先行攻略雲南，斷絕中國國際補給線，蔣中正乃於 1941 年 10 月 26 日指示林蔚，軍令部應重行檢討日軍侵略雲南之戰略部署，以及國軍準備之工事、交通、通信、補給計畫。[45]林蔚受命後進行規劃，建議應指派指揮人員或組織幕僚機關，專事該方面之作戰事宜。蔣隨即於官邸會報上命令林蔚組織參謀團赴雲南襄助指揮作戰，參謀團於焉建立。[46]

41 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收入《遠征印緬抗戰》，頁 11；Mr. Eden to Sir A. Blackburn (Chungking), 22 April 1941, F.O. 436/16158 [F3077/60/10].

42 在中方會議記錄，丹尼斯這句話之後不知誰寫下「自私已極！」後來劃去。〈商震林蔚等與戴尼斯等第一次談話紀錄〉（1941 年 7 月 24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40-005，「革命文獻──對英外交：一般交涉（二）」。

43 Mr. Eden to Sir A. Clark Kerr (Shanghai), 24 March 1941, F.O. 436/16158 [F1846/523/G].

44 Mr. N. G. Morrison to Mr. Harrison, 6 January 1942, Liaison with Chinese Forces, F.O. 371/31632 [F384/74/10].

45 〈林蔚日記〉，1941 年 10 月 26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下略），《徐永昌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冊 6，1941 年 10 月 29、30 日，頁 246-247。

46 〈林蔚日記〉，1941 年 10 月 28、30 日。

「軍事委員會駐滇參謀團」由林蔚擔當主任，作爲軍委會的派出機構，駐紮在雲南省會昆明，幹部人員於 11 月 1 日組成，爾後續有擴大。[47]之所以選派林蔚出掌，考量點或有三。第一、林蔚雖爲浙江人，已派駐西南一段時間，積累地緣關係，且參與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未久，對雲南周邊的戰略地位了解較深。第二、林曾任蔣中正近身的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同時身兼軍令部次長。在軍令部中，部長爲晉綏軍出身的徐永昌，另一位次長劉斐係桂軍出身，林則代表中央軍，於前線既代表中央負責軍事作戰的軍令部，也象徵最高統帥蔣中正親臨坐鎮。第三、參謀團爲一種高層次聯絡官制度，主要任務是聯繫與溝通各方，林蔚爲蔣中正所信任，資歷深、階級高（陸軍中將），擁有一定權威可資溝通，且其曾參與戰爭初期的華北之役，以及徐州會戰等臨時參謀團工作，在聯繫業務上已具相當經驗。[48]

參謀團成員並考慮專業背景，概於軍委會所屬三個重要部門軍令部、軍政部、軍訓部之中，抽調一批軍事專家組成。參謀總長何應欽作爲軍委會僅次於蔣中正的人物，擁有跨部會統合的權力，他與高級幕僚精心挑選參謀團成員，參謀團最終匯集不少菁英，包括軍事教育主管、各兵種領袖或專家等，經短期調用，任務完畢即歸建原單位。

參謀團之團長、副團長、高級參謀以降，由參謀處、總務處構成。參謀處又分成第一科（作戰）、第二科（情報）、第三科（後勤），人員大多由軍令部調用。[49]（表 2）參謀團成員與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有延續之處，除了林蔚，參謀團負責對外聯絡的侯騰（1907-1963）、馮衍，以及參謀劉方矩（1914-1981）等，皆曾參與考察團。

---

47 〈林蔚致蔣中正報告〉（1941 年 11 月 1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06-060，「革命文獻 —— 抗戰方略：後方部署」。

48 蘇聖雄，《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 —— 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頁 64-65；沈定，〈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抗戰〉，收入《遠征印緬抗戰》，頁 154-155；〈蔣中正電閻錫山敘明任命徐永昌爲保定行營主任等〉（1937 年 8 月 17 日），國史館藏，《閻錫山史料》，典藏號 116-010101-0118-062，「全面抗戰南口會戰暨張垣失陷案（二）」。

49 沈定，〈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抗戰〉，收入《遠征印緬抗戰》，頁 151-153。

表 2　軍事委員會駐滇參謀團名錄

姓　名	軍銜及職務	原任職務	附　註
林　蔚	中將團長	軍令部次長	曾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
阮肇昌	中將副團長	軍訓部次長	後接任陸軍大學教育長
邵百昌	中將高級參謀	要塞砲兵司令	砲兵權威
華振麟	中將高級參謀	通信兵指揮官	全國通信領導
林柏森	中將高級參謀	工兵學校教育長	全國工兵領導
斯　立	中將高級參謀	輜重兵學校教育長	全國輜重兵領導
馬崇六	少將高級參謀	國防工程處處長	留日工兵專家
蕭毅肅	中將參謀處處長	總長辦公室高參	何應欽親信
許高陽	少將總務處處長	軍委會桂林辦公廳高參	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幕僚
		參謀處第一科（作戰）	
涂　健	上校科長	軍令部第一廳科長	後調升杜聿明部少將參謀長
趙德樹	少將參謀	軍令部第一廳參謀	
		參謀處第二科（情報）	
李立柏	少將科長	軍令部第二廳科長	熟悉日本情況
劉方矩	中校參謀	軍令部第二廳參謀	英語翻譯
仲偉成	中校參謀	軍令部第二廳參謀	
陳家鼎	少校參謀	軍令部第二廳參謀	英語翻譯
		參謀處第三科（後勤）	
楊　鐸	少將科長	江南兵站統監部參謀長	
朱樹滋	中校科員	兵站部科員	軍用文官
袁進機	上校參謀	軍令部通信參謀	
沈　定	少校參謀	軍令部通信參謀	
		總務處	
王雲衡	上校高級副官	軍令部第三廳高級副官	林蔚親信
林篤弁	上校科長	軍政部科長	
錢　斌	中校秘書	軍令部秘書	林蔚秘書
		特種兵參謀	
李雲鵬	上校砲兵參謀	砲兵學校教官	邵百昌的助手
羅崇典	中校工兵參謀	工兵學校教官	林柏森的助手
時道玄	少校工兵參謀	工兵學校教官	林柏森的助手
		盟軍聯絡官	
侯　騰	陸軍少將	中國軍事代表	參謀團入緬後納入指揮
馮　衍	陸軍少將	聯絡處	參謀團入緬後納入指揮
黃褚彪	空軍中校	空軍聯絡參謀	參謀團入緬後納入指揮

資料來源：〈林蔚致蔣中正報告〉（1941年11月1日），《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06-060，「革命文獻──抗戰方略：後方部署」；沈定，〈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戰役〉，頁151-155。

說明：本表爲參謀團部分狀況，以資料不全，尚不全面，如參謀處第一科有 7-8 名參謀，本表只列 2 員。參謀團且有譯電人員、電報班、日本新聞抄譯班、無線電臺、電話隊等。

林蔚與參謀團成員於 1941 年 11 月 3 日由重慶乘飛機抵達昆明，居於西山何應欽別墅。參謀團先向雲南軍事領袖龍雲（1884-1962）、盧漢（1896-1974）了解情況，交換意見，[50]繼赴滇南主要部隊第一、第九集團軍駐地，視察部隊訓練和裝備，復考察國境線的地形、配備、防禦工事、哨所等情況。[51]

參謀團以現地考察爲基礎，討論擬訂作戰計畫草案，呈報軍委會審核。[52]軍令部原先已擬有〈確保滇緬路作戰計畫〉，[53]此時參謀團重行研究，擬具 18 項檢討意見。[54]計畫既定，參謀團開始推動實施，將計畫按性質分別密令有關部隊與機關，以爲準備之依據。參謀團與昆明行營復進一步擬訂〈昆明會戰準備計畫〉，並持續措意於工事構築及道路運輸、汽油、糧秣彈藥等後勤事宜。[55]

（二）參謀團入緬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接連攻下東南亞各地，太平洋戰爭爆發。林蔚默察局勢，認爲國軍全盤部署，應從防禦改爲攻勢作戰，連電蔣中正、何應欽、徐永昌等，指出日軍進攻目標必在緬甸與馬來亞。他先前考察兩地，已知其戰備不足，若之後緬、馬危急，則聯合作戰愈感棘手。爲今之計，惟有迅速將國軍雲南部隊馳入緬甸，與英軍並肩入泰作戰，而由於聯合作戰統一指揮不易，「似可採用幕僚體制，以求得彼此相互間適切協同」。[56]

---

50 〈林蔚致蔣中正報告〉（1941 年 12 月 3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06-061，「革命文獻——抗戰方略：後方部署」。

51 沈定回憶參謀團係 1941 年 3 月到達昆明，以林蔚日記校之，應爲 1941 年 11 月 3 日。沈定另回憶當時有「滇南防守計畫」之擬訂，應爲 1941 年初之事，與此時的參謀團無關。沈定，〈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抗戰〉，收入《遠征印緬抗戰》，頁 155-156；〈林蔚日記〉，1941 年 11 月 3 日；〈何總長與龍主任商談滇南作戰準備問題紀錄〉（1941 年 1 月 20 日），《蔣檔》，典藏號 002-080103-00036-005，「全面抗戰（三）」。

52 〈林蔚日記〉，1941 年 11 月 15、18、20 日。

53 〈軍令部擬《確保滇緬路作戰計畫》〉，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下略），《滇緬抗戰檔案（上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9），頁 10-12。

54 〈林蔚日記〉，1941 年 11 月 22-23 日。

55 〈林蔚日記〉，1941 年 11 月 25-29 日、12 月 20 日。

56 〈林蔚致蔣中正電〉（1941 年 12 月 10、16 日），《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296-047、048，「一般資料——民國三十年（三）」；〈林蔚致蔣中正電〉（1941 年 12 月 12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19-001，「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

戰局的變化，應驗林蔚的評估，東南亞各地受到日軍進攻，英軍請求國軍支援。林蔚及其團隊先前參加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已擬訂國軍入緬計畫，此時林不斷建議主動出兵，終於有機會將其計畫付諸施行。不過，英軍初始要求的兵力並不多，僅一師一團。[57]蔣中正與林蔚皆亟欲早日派兵赴緬，但蔣與林蔚思路迥異，國軍入緬後沒有要與英軍聯合攻泰，而是確保滇緬路對外交通線。[58]

出兵緬甸既已決定，林蔚在昆明部署防務與規劃入緬部隊順序和輸送等事宜。[59]他指定部隊擔任雲南境內各機場之警備，並且研究昆明、開遠間之中間陣地計畫；針對滇緬路西段的作戰，也基於過去對地形與交通的考察，向蔣中正提出建議。[60]

由於參謀團原是爲昆明防務而組建，此時任務已經轉移，林蔚開始考慮參謀團的下一步。經過研究，林蔚將部分人員歸建原來單位，留下的特種兵參謀組成第一科，由上校通信參謀袁進機代理科長；留下來的第二科（情報）參謀仍屬第二科，由中校參謀劉方矩代理科長；第三科不再設置，後勤業務由第一科兼辦。團長林蔚、參謀處長蕭毅肅等仍留下，領導新改組的參謀處第一、第二科，掌握敵情與國軍部隊之調動。[61]

此際戰況急轉直下，日本南方軍接連進佔泰國、越南、馬來亞、新加坡，截斷英國東方航路，乘勝進攻緬甸，1942 年 1 月攻陷毛淡棉，進逼緬甸最重要的港口仰光。[62]緬情危急，英軍於 1942 年 1 月底、2 月初請求更多國軍入緬。其實 1941 年 12 月中旬，蔣中正已下令動員大軍準備入緬作戰，但英軍請國軍

57　《徐永昌日記》，冊 6，1941 年 12 月 20 日，頁 297。
58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頁 92。
59　〈林蔚日記〉，1941 年 12 月 16-21 日。
60　〈林蔚致蔣中正電〉（1941 年 12 月 21 日），《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296-058，「一般資料——民國三十年（三）」；〈林蔚阮肇昌致蔣中正電〉（1942 年 1 月 13 日），《蔣檔》，典藏號 002-090105-00008-044，「遠征入緬（三）」。
61　〈林蔚日記〉，1941 年 12 月 29 日；沈定，〈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抗戰〉，收入《遠征印緬抗戰》，頁 157。
62　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大東亜戦争》（東京：芙蓉書房，1998），頁 101-104。

大部隊暫勿入緬，遠征軍乃停止進軍，於滇緬路上集結待命。1942 年初，隨著情勢趨緊，英方轉變態度，迭次請求國軍迅即入緬。[63]

蔣中正隨即命參謀團轉令遠征軍陸續入緬，按第六軍、第五軍之順序開始輸送，並命第五軍入緬後，即歸英緬軍總司令胡敦（Thomas J. Hutton, 麥克萊後任）指揮。[64]2 月 19 日，林蔚認爲指揮體系仍不明確，電參謀總長何應欽，告以國軍第五、第六軍入緬作戰若全委胡敦指揮，恐難與國軍之作戰企圖相適應，故建議第五、第六兩軍應歸一人指揮，即以兩軍中的資深軍長任之。報告上呈後，林蔚著即於 2 月 25 日電令遠征軍全軍，入緬作戰統一指揮機構未成立以前，由第五軍杜聿明軍長統一指揮，而杜軍長仍受胡敦指揮；同日，林蔚又直接電令杜聿明率幕僚人員剋日趕赴緬甸臘戍，秉承胡敦之命部署作戰。[65]

蔣中正相當重視這次遠征，親赴昆明會見林蔚及各軍長，決定遠征軍之部署，訓示入緬注意事項。[66]2 月 26 日，侯騰由臘戍飛昆明，27 日與林蔚一同向蔣中正報告緬甸情況及英緬軍總司令胡敦之部署意見。蔣重申參謀團前令，將第五、第六兩軍暫歸杜聿明統一指揮，而杜聿明受胡敦指揮。[67]

3 月 1 日下午，林蔚陪同蔣中正從昆明飛臘戍。2 日，英印軍總司令魏菲爾（Archibald Wavell, 又譯韋維爾）將軍赴臘戍晉謁蔣中正，報告緬甸各情，雙方談一刻鐘。[68]在初步了解英軍行動及整體戰況後，蔣於 3 日在臘戍召集參

63 "The following Despatch was submitte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 on the 14th July, 1942, by General Sir Archibald P. Wavell, G. C. B., C. M. G., M. C., A. D. C., Commander-in-Chief, India," on Operations in Burma from 5th March, 1942, to 20th May, 1942," *The London Gazette*, 11 March 1948, pp. 1669-1670.

6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頁 7；〈林蔚致蔣中正等電〉（1942 年 2 月 6 日），《蔣檔》，典藏號 002-090105-00007-101，「遠征入緬（二）」；〈蔣中正致龍雲林蔚等電〉（1942 年 2 月 19 日），《蔣檔》，典藏號 002-090105-00006-037，「遠征入緬（一）」。

65 《林蔚報告書第一冊》，頁 64-65。

66 〈蔣中正日記〉，1942 年 2 月 22、25 日；蔣中正，〈目前國際形勢之檢討與駐滇部隊之急務〉（1942 年 2 月 28 日），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9，頁 32-41。

67 《林蔚報告書第一冊》，頁 64-65。

68 〈蔣中正日記〉，1942 年 3 月 2 日。

謀團及第五、第六兩軍訓話。[69]會後林蔚遵奉蔣的指示，召集第五軍杜聿明軍長、第六軍甘麗初軍長，商定兩軍作戰地境。[70]4 日，蔣返昆明，臨行前令參謀團團長林蔚留臘戍，並續調該團中將高級參謀兼參謀處長蕭毅肅率領部分人員到臘戍工作，指導中國遠征軍部隊與英方協調作戰事宜，至是參謀團入緬，名稱由「駐滇參謀團」改爲「滇緬參謀團」。[71]

（三）參謀團的地位

參謀團既已入緬，而遠征軍係由第五軍軍長杜聿明統一指揮，如是則參謀團於指揮體系中的地位爲何？從上述規定遠征軍指揮權的過程，可以看到參謀團高於遠征軍，並非遠征軍的「參謀」或是諮詢機關，實際上得以參與遠征軍的組織調整。其實 3 月 3 日蔣中正在臘戍前線時，已明確指示遠征軍各高級官長，參謀團的角色是「指導」中國入緬軍之作戰行動並與英方折衝。[72]蔣對英屬緬甸總督多曼史密斯（Reginald Dorman-Smith）亦明白表示，國軍若紀律不嚴，請直接通知參謀團團長林蔚。[73]是以，參謀團與遠征軍的關係是參謀團代表蔣中正或重慶軍令部指導遠征軍，戰事期間，林蔚在給蔣的信函中，乃明確提及這是他的「作戰指導經過情形」。[74]

由於參謀團具有蔣中正欽定的指導地位，論者或視之爲「統帥部派駐遠征軍的最高指揮決策機構」，[75]並謂參謀團「機構雖然不大，但是權力比當時的戰區司令長官還要大，當時只有軍令部和委員長侍從室可以用蔣介石的名義發布命令。軍委會參謀團可說是小型的軍令部，與軍令部具有同等的權力」，「必

69 〈蔣中正對入緬作戰軍高級長官訓話〉（1942 年 3 月 3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19-010，「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

70 《林蔚報告書第一冊》，頁 32。

71 沈定，〈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抗戰〉，收入《遠征印緬抗戰》，頁 153。

72 〈蔣中正對入緬作戰軍高級長官訓話〉（1942 年 3 月 3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19-010，「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林蔚報告書第一冊》，頁 65、67。

73 周美華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11），冊 48，頁 453、460-461。

74 〈林蔚致蔣中正函〉（1942 年 3 月 30 日），《蔣檔》，典藏號 002-080103-00060-004，「盟軍聯合作戰（五）」。

75 盛兆，〈滇緬抗日雜憶〉，收入《遠征印緬抗戰》，頁 165。

要時，參謀團團長可以在所在地區代行軍委會委員長即蔣介石的職權，如有違抗命令者，得以先斬後奏」。[76]如此形容或許過於誇大，但參謀團具有相當權力應是可以肯定。

相對於參謀團的「指導」，在規定杜聿明統一指揮之後，隨著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的上任，蔣中正於 3 月 11 日下令第五、第六軍統歸史迪威「指揮」，並且明確表示可利用林蔚之「總部」（即參謀團本部，時已推進至緬甸臘戍）協助指揮工作。蔣並且向史迪威明言，已令林蔚給予史迪威一切便利，史迪威若在後方（臘戍），可視林爲其「參謀長」。[77]不過，由於史迪威常在前線，林蔚並未成爲史迪威的參謀長，二者工作仍有區別。

林蔚與史迪威工作上的區別，就理想型（ideal type）而論，即作戰「指導」與「指揮」的區別，這在軍事學上有明顯區分。一般作戰「指導」，係任務及執行概念的宣布、初期資料的分發與重要提示等；作戰「指揮」則爲有隸屬關係間之有關作戰控制之行爲，指揮官將個人意志變成所屬部隊之行動。[78]易言之，二者概念上較明顯的劃分爲指導偏重「提示」，指揮偏重「控制」，這即是林蔚與史迪威雙方任務性質上的差異；當然，這是理論，實務上並不那麼判然區別。

林蔚的指導，可從其電令稱呼略見一斑。參謀團對參謀團聯繫範圍的昆明行營（主任龍雲上將）、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盧漢上將）、第五集團軍（總司令杜聿明中將）、第九集團軍（總司令關麟徵中將）等四個單位，屬於一般性指導者由林蔚直接掛名，雖林爲中將，仍用平行稱謂，如「龍主任志公」、「盧總司令永衡兄」、「杜總司令光亭兄」、「關總司令雨東兄」；如屬指揮命令性質者，則以蔣中正名義發出，署名「蔣中正（日韻）滇參」。[79]也就是說，

76 沈定，〈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抗戰〉，收入《遠征印緬抗戰》，頁 153。

77 〈蔣中正接見史迪威談話紀錄〉（1942 年 3 月 11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19-016，「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

78 國防部編，《國軍軍語辭典（九十二年修訂本）》（臺北：國防部，2003），頁 6 之 47、6 之 48、6 之 50。

79 沈定，〈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抗戰〉，收入《遠征印緬抗戰》，頁 153-154。龍雲字志舟，盧漢字永衡，杜聿明字光亭，關麟徵字雨東。

林蔚作爲參謀團主任站在指導立場，不受階級所限；如牽涉指揮，參謀團不宜直接出面，改以最高統帥名義。

史迪威受命統一指揮遠征軍未久，蔣中正又派衛立煌爲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杜聿明爲副司令長官，在衛未到任以前，由杜聿明代理。[80]此一命令，並未規定司令長官與史迪威之關係。至 4 月 3 日，蔣改派羅卓英爲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遠征軍之指揮自是由史迪威與羅卓英共同負責。[81]（圖 1）其實，蔣中正雖然三令五申賦予史迪威指揮權，史迪威並沒有總司令的關防，只有盟軍參謀長的印信，他始終是以蔣中正參謀長的名義指揮遠征軍，某種程度暗示他不是司令官而僅爲顧問（advisor）。[82]制度上的曖昧，使得代表蔣中正指導遠征軍的林蔚之作用突顯出來，這在後續戰事過程中將不斷出現（詳後）。[83]

至於遠征軍與英軍之指揮隸屬，自史迪威上任以來始終未定。原來應英方所請，蔣中正將遠征軍交由英軍總司令統一指揮，後來判斷英軍數量較少，應由統率國軍的史迪威統一指揮，遂託外交部長宋子文轉請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與英方洽商。羅斯福致函英方，主張強化史迪威的角色，英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沒有表示意見。最後，英緬軍總司令亞歷山大（Harold Alexander, 胡敦後任）[84]和史迪威相互指揮權並未明定。[85]

---

80 〈蔣中正致林蔚電〉（1942 年 3 月 12 日），《蔣檔》，典藏號 002-090105-00008-184，「遠征入緬（三）」。

81 史迪威與羅卓英的關係，是羅卓英受史迪威之指揮，而在緬國軍受羅卓英之指揮。換言之，史迪威無法直接指揮遠征軍，需藉羅卓英轉令。〈蔣中正與史迪威等在梅苗會議記錄〉（1942 年 4 月 7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19-043，「革命文獻 —— 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林蔚報告書第一冊》，頁 66。

82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53), p. 120; Louis Allen, *Burma: The Longest War, 1941-1945* (London: Phoenix Press, 2000), p.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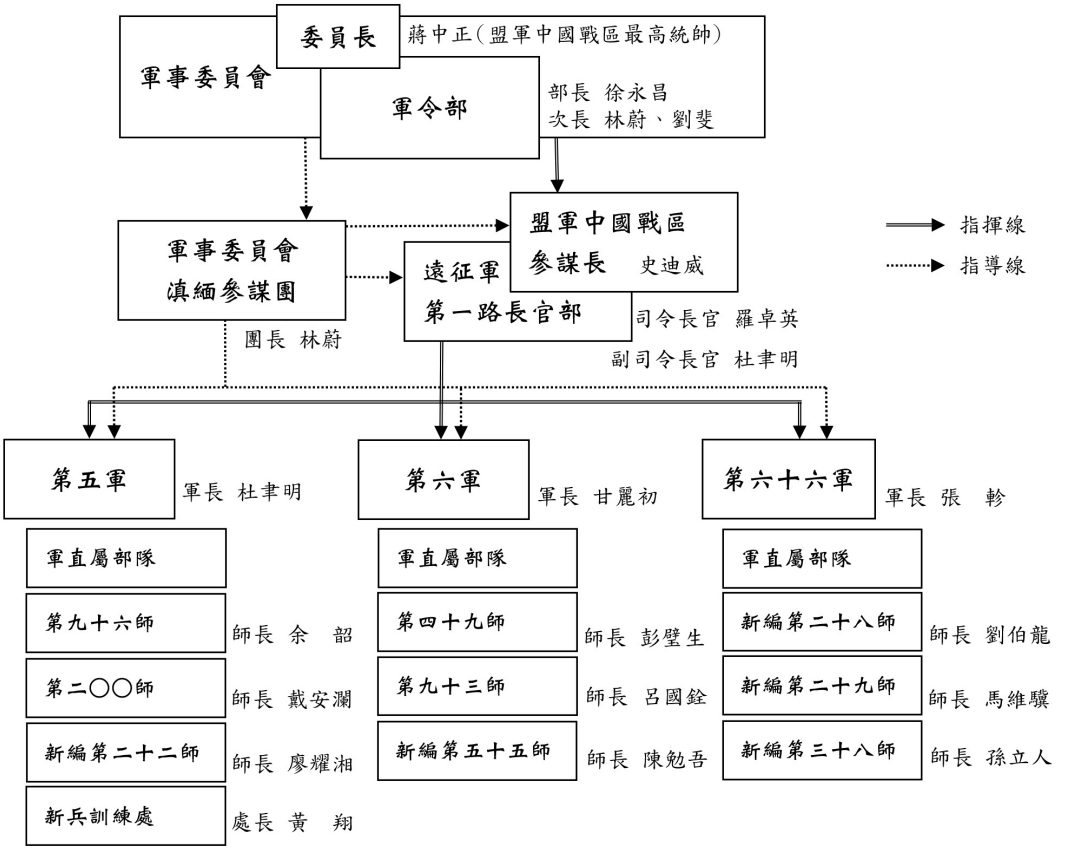
83 Stanley Woodburn Kirby, C. T. Addis, et al., *The War against Japan*, *Vol. II*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58), p.156.

84 由於胡敦初戰不利，英方換上有歐戰經驗、曾指揮敦克爾克撤退的亞歷山大指揮英緬軍。Robert Lyman, *Slim, Master of War: Burma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Warfare* (London: Constable, 2004), p. 11.

85 《林蔚報告書第一冊》，頁 68。〈蔣中正致宋子文電〉（1942 年 3 月 9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16-050，「革命文獻 —— 同盟國聯合作戰：重要協商（一）」；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V: The Hinge of F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pp. 148-150.

因此，國軍入緬作戰，理論上負責指揮者爲史迪威與羅卓英，負責指導者爲參謀團，而英軍之最高指揮官爲亞歷山大。三者駐地，參謀團以任務關係，駐遠征軍後方之臘戍，英軍亞歷山大駐曼德勒東邊的梅苗，史迪威與羅卓英則駐較前線的瓢背；三個高級機關分駐臘戍、梅苗、瓢背三處，各司其職。[86]

圖 1　第一次緬甸戰役國軍指揮系統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86　史迪威到任，初駐梅苗，後與羅卓英進駐更前方的瓢背。《林蔚報告書第二冊（二）》，頁 25。

（四）參謀團的聯繫工作及其物質條件

軍事指導與聯繫各方是參謀團的主要任務，後者更爲突出。其實，參謀團作爲聯絡官制度的一環，指導各部隊也就是執行最高統帥對各部的一種聯繫工作。由於中英兩軍在指揮體系與駐地未能建立充分溝通管道，參謀團的聯繫作用便益加突顯。國軍對英軍動態的了解，有賴參謀團的聯繫，並且相對於史迪威與新進入緬的國軍部隊，林蔚所領導的參謀團具備事前考察的經驗，對兵要地誌與英軍狀況相對熟悉。

參謀團在遠征軍的主要聯繫模式，由上到下是蔣中正或軍令部發給入緬部隊的電報，先發到參謀團後再予轉發；由下到上的遠征軍長官部或各軍情報和戰報，也先送給參謀團，再由參謀團轉報到重慶方面。國軍鮮少遠出國門作戰，可以想見這個過程，聯絡／通信工具扮演著重要角色，而參謀團就掌握著這些工具；物質條件影響軍事作戰，此爲一顯例。

當時的通信方式是有線電報、有線電話、無線電報，前二者線路、器材有限，參謀團嘗試補救仍難克服，遠征軍作戰之通信主要便採無線電報。[87]軍用無線電之通信，由無線電部隊操作，各無線電部隊分別配屬參謀團、遠征軍第一路長官部、遠征軍一路副長官部、駐印緬軍事代表辦事處，然後再分配到各師。參謀團擁有的無線電部隊較多，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臘戍的第三報話臺，通信電力高達 1,000 瓦特，係軍政部在全國的五個無線電報話臺之一。[88]

一般而言，無電線功率愈強，傳播愈遠，穩定性也較高。[89]參謀團掌握全緬國軍最大的無線電臺，對重慶得藉由 1,000 瓦大型軍用電臺聯繫；對遠征軍

87　《林蔚報告書第三冊》，頁 23-35、39。

88　其他 4 個設置於昆明、桂林、重慶、上饒。〈何應欽致蔣中正報告〉（1942 年 4 月 8 日），《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297-022，「一般資料 —— 民國三十一年」。

89　軍用無線電機之功率與其應用，係 15 瓦特軍用無線電報機專爲野外移動電臺之用；50 瓦特軍用無線電報機專爲陸上電臺通信之用，亦便於移動；100 瓦特短波無線電報機專爲陸上電臺通信之用；500 瓦特無線電報機專爲陸上電臺遠程通信之用。亦即，陸軍低功率電臺重視移動方便，高功率電臺則重視遠程通信。王錫恩，《無線電原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頁 99；范鳳源，《無線電報務員須知》（出版地不詳：空軍軍官學校，1934），頁 181-194。

長官部之間，以電話及無線電報聯絡；對左右翼部隊，以無線電報專臺聯絡，此外還有有線電臺、長途電話可資利用；對昆明方面則以有線、無線雙重聯絡。在當時通信條件之下，所擁有的通信網相對完備。[90]

至於遠征軍正、副長官部的電臺，功率最高 50 瓦特，這些電臺部分是戰役開始後從參謀團撥出的，可資各部隊縱向、橫向聯繫。[91]各師則有一個通信排，配有功率 15 瓦特的無線電，用於師到團、營尚可應付，如欲遠距離則非力所能及。[92]（表 3）

各部隊電臺功率較小，難以向重慶直接通報，屬參謀團的第三報話臺便擔當重慶與在緬各部隊間轉報之責，承上啓下，聯繫溝通，發揮重要作用。其過程爲參謀團第三報話臺收重慶之報，交參謀團小電臺轉各部隊；參謀團小電臺又收各部隊之報，交第三報話臺轉重慶。其中一個例外是參謀團在梅苗的駐印緬軍事代表處，處長侯騰管控軍政部第三十四電臺，該電臺功率較高，有 100 瓦特，可經昆明電臺轉接與重慶通電。[93]因此，羅卓英長官部駐梅苗時，可藉侯騰之電臺直接與重慶聯繫；[94]杜聿明有時亦藉侯騰的電臺向蔣中正轉報戰情。[95]緬情緊急之際，蔣中正曾對於前線高級司令部無法直接與重慶的電臺聯絡抱怨連連，自記：「前方長官部軍部皆無直接與渝通電之電臺，各部隊密碼與陸空聯絡符號，皆未準備預約，入緬部隊疏漏極矣，何能不敗？」[96]顯示各部通訊器材之不足，亦映現參謀團在通信上的重要性。

---

90 沈定，〈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抗戰〉，收入《遠征印緬抗戰》，頁 155。

91 《林蔚報告書第三冊》，頁 41-42。

92 雲鎮，〈懷念孫將軍〉，收入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編輯委員會，《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臺北：孫立人將軍紀念館籌備處，1992），頁 135。

93 電報經過轉接，或有遲延與呼叫不靈的狀況。〈林蔚致蔣中正函〉（1942 年 3 月 28 日），《蔣檔》，典藏號 002-080103-00060-004，「盟軍聯合作戰（五）」。

94 《林蔚報告書第三冊》，頁 41-42、45。

95 如同古戰鬥時，3 月 22 日杜聿明致蔣一電報告戰鬥經過，重慶方面幕僚註明該電係梅苗電臺轉報，發至第五軍駐渝電臺，再送到軍委會辦公廳機要室。〈杜聿明致蔣中正電〉（1942 年 3 月 22 日），《蔣檔》，典藏號 002-090105-00007-382，「遠征入緬（二）」。第五軍並藉由林蔚的電臺與重慶方面通訊，因此現存檔案頗多蔣、杜間往來函電。

96 〈蔣中正日記〉，1942 年 4 月 28 日。

無線電固然相對方便，惟極易爲敵竊取，尤其是與最高統帥蔣中正間的通訊。蔣因此叮囑其重要指示必須避免使用無線電傳遞，規定以三架飛機負責飛行遞送航空信箱。[97]此外，參謀團爲加強前方部隊之輔助通信，曾囑杜聿明設置機踏車哨，撥用三輪車、吉普車擔負重要文件之遞送。[98]

表 3　入緬無線電通信部隊配屬一覽表

配屬機關	電臺（班）番號	臺（班）長姓名	功率（瓦特）	備考
參謀團（林蔚）	軍政部第三報話臺	劉繩武	1000	3月6日到臘戍先向後勤部長俞飛鵬報到，3月14日劉繩武向參謀團報到，開始受參謀團指揮
	通六團二營第七班	王通一	15	4月7日起配屬參謀團工作
	通六團三營第四班	徐逸容	15	3月21日配屬參謀團工作
遠征軍第一路長官部（羅卓英）	通六團二營第三班	史耀庭	50	3月21日至4月7日配屬參謀團，4月7日以後配屬長官部(4月10日報到)
	通六團三營第五班	崔光耀	50	3月21日至4月7日配屬參謀團，4月7日以後配屬長官部(4月10日報到)
	通六團二營第四班	胡漢光	15	4月20日向長官部報到
遠征軍第一路副長官部（杜聿明）	通六團二營第五班	祿九瑞	50	3月21日至瓢背報到
	通六團獨立第一班	趙紀昌	15	此5個班係軍政部駐昆辦事處奉蔣中正諭編配成立，3月27日到臘戍，4月4日到瓢背副長官部報到，原擬供聯絡人員使用
	通六團獨立第二班	游克岐	5	
	通六團獨立第三班	任　錚	15	
	通六團獨立第四班	高　璧	15	
	通六團獨立第五班	田　浩	5	
參謀團轄駐印緬軍事代表辦事處（侯騰）	軍政部第三十四電臺	計昌宗	100	2月間已到梅苗，撤退後歸還建制

資料來源：改繪自《林蔚報告書第三冊》，頁42。

以上係參謀團與遠征軍之聯繫與通信的物質狀況。與盟軍的聯絡方面，參謀團入緬以前，軍令部便派侯騰爲軍事代表，在臘戍與美、英方面聯繫；復於

97　《林蔚報告書第三冊》，頁 51。或是航班有限，蔣與前線重要訊息仍多以無線電傳遞。
98　《林蔚報告書第三冊》，頁 51。

臘戍設一聯絡處，派馮衍負責；中國空軍總部也以黃褚彪爲聯絡官，與美國空軍聯繫。[99]

林蔚及參謀團人員入緬推進至臘戍後，侯騰、馮衍、黃褚彪三人皆歸參謀團指揮，繼續負責與美、英方面的聯絡工作。[100]然而參謀團既已入緬，諸多聯絡事宜紛至沓來，對敵軍行動無從探悉，對友軍狀況亦不明瞭，且與英方待商之事日多，無法事事仰賴侯騰等的聯繫。於是，參謀團在臘戍發起中英軍事聯席會報，議定由林蔚爲主席，中方派必要人員參加，英方則派丹尼斯將軍（即前面提及在重慶與林蔚開會者）及馬丁將軍（J. C. Martin）與相關人員參加，每日開會一次，以資聯繫。[101]這是整個戰役期間，中英常態聯繫最重要的平臺。英軍十分肯定丹尼斯作爲英方聯絡官（chief liaison officer）的作用，認爲這個平臺使英軍能夠掌握國軍動態，進行補給與聯繫；[102]反面來看，參謀團與英軍聯繫也發揮了一定作用。

參謀團與英軍的聯繫往還，有助於國軍諸多業務的推展，如補給與交通，惟其中仍有一些難題無法克服，作爲作戰基礎的地圖是關鍵一例。遠征軍異地征戰，地圖不確則用兵失其憑藉。參謀團雖對緬早有調查，惟即便是中國領土雲南，國軍地圖已不精確，需要各守備部隊自繪自備，緬甸地圖因此難期更佳。[103]遠征軍入緬之際，參謀團只有 200 萬分之 1 中文緬甸全圖數份，此外另有駐昆英領事所送 1 英吋比 16 英里之英文緬甸撣邦簡圖三十餘份。時第五、第六軍各部隊紛向參謀團請領較詳細的大比例尺地圖，參謀團所有者既不適用、亦不敷用，乃電請軍令部發給，但軍令部亦僅有 200 萬分之 1 及 100 萬分之 1 的中文地圖兩種，均屬小比例尺，且此兩種地圖在參謀團入緬後始由貴陽

99 沈定，〈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抗戰〉，收入《遠征印緬抗戰》，頁 155。
100 沈定，〈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抗戰〉，收入《遠征印緬抗戰》，頁 155。
10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 20。
102 “Report by Lieut.-General T. J. Hutton, C. B., M. C., on Operations in Burma from 27th December, 1941, to 5th March, 1942,” *The London Gazette*, 11 March 1948, p. 1678. 丹尼斯後來在戰役期間墜機身亡。
103 〈林蔚日記〉，1941 年 12 月 1 日。

趕送臘戍，而前方業已開始作戰，故遠征軍各部所用之地圖，均係參謀團接洽英方所發英文原圖。[104]

參謀團向英軍索圖頗不容易，最初僅得 200 萬分之 1 及 100 萬分之 1 兩種各數份，僅可供戰略、會戰戰地之參考，戰術或局部地形頗爲不足。林蔚屢囑侯騰向英方索取更精細者，稍晚始獲 1 英吋比 4 英里及 1 英吋比 1 英里兩種地圖，惟仍殘缺不全；至於前方部隊所得大比例尺地圖，則僅限於其所在地區及運動地區一帶。[105]

在參謀團與英軍聯繫之下，遠征軍地圖整備情況略有改善。至於重慶後方，由於較好的地圖發給前線部隊與單位，重慶方面僅有 200 萬分之 1 及 100 萬分之 1 的中文地圖兩種，而此兩種地圖所譯地名，多數迥不相同，並且對極重要之作戰路線繪製不清，即緬甸東路同古、毛奇、羅衣攸、雷列姆、臘戍公路，在 200 萬分之 1 的地圖上顯得斷斷續續，在 100 萬分之 1 的地圖上則沒有畫任何公路，呈現該地地形盡爲山嶺叢雜之地。軍令部及侍從室主任賀耀組屢次索要各比例尺之英文原圖，均無法獲得。[106]

重慶後方擁有的地圖如此不精，嚴重影響最高統帥蔣中正的判斷。蔣中正所閱讀的地圖，緬甸東路之毛奇到羅衣攸公路未通，直到戰況緊迫，蔣才知此地可通，並且能連接到遠征軍後方重鎮臘戍，因此未對日軍可能從東路迂迴至國軍後方有充分防範。[107]參謀團的地圖相對精細，且經林蔚現地考察，與蔣認識的戰役圖景有所不同，其間的落差對戰局產生重大影響，後文將有述論。

要之，國軍遠出國門作戰，統帥部需要對現地部隊充分掌握，乃有參謀團的設置，賦予參謀團重要的縱向、橫向聯繫工作，並使之擁有關鍵通訊設備及地圖。當統帥部須向前線提示作戰部署時，自然透過主要聯繫管道參謀團爲之，參謀團由是兼具作戰指導任務，不單單是個轉傳聯絡機構。又由於參謀團

104　《林蔚報告書第三冊》，頁 59。
105　《林蔚報告書第三冊》，頁 59-60。
106　《林蔚報告書第三冊》，頁 60-61。
107　〈蔣中正日記〉，1942 年 4 月「本月反省錄」。

係軍委會在現地的代表，林蔚個人爲中央大員，參謀團的指導乃具相當權威。此一情態，具體展現統帥部對緬戰的重視，欲以參謀團之組織確實掌握戰局。

四、戰役進行中的參謀團

1942 年 3 月 4 日，林蔚率參謀團移駐緬甸臘戍，展開戰役之指導與聯繫。本節將參謀團置於戰役過程，陳述參謀團居間的作用，以明其運作實況與影響，同時折射出參謀團角度的第一次緬甸戰役，爲相關歷史提供不同視角。歸納整理，其作爲概有戰役初期戰術布局之指導、同古戰鬥期間與史迪威相折衝、戰役末期國軍之撤退部署。本節並以參謀團爲核心，探討長久以來的爭議性話題——戰役過程蔣中正越級指揮的問題。

（一）戰役初期部署：參謀團對東西兩路的戰術指導

林蔚在臘戍發起中英軍事聯席會報不久，日軍進展迅速，3 月 8 日佔據仰光。次日，林蔚綜合判斷戰情，向蔣中正提出戰況報告，他指出英軍必陸續後撤向普羅美移動，其力量脆弱難望固守，更難望其反攻；日軍在佔領仰光之後，必從水陸兩方增加部隊向北進攻，第一步目的必爲緬中曼德勒，第二步目的爲緬北八莫、密支那或臘戍，其兵力應爲三至四個師，分兩路前進，主力或在西路伊洛瓦底江方面，於擊退英軍後，向國軍右後方平滿納、他希迂迴，如此則國軍右側背（西側）無屏障，而同古部隊亦必陷孤立。[108]

林蔚戰況報告對於日軍將迂迴國軍後方之戰術判斷相當正確，他於先前考察緬印軍事後，曾檢討日軍戰法有速戰速決主義、獎勵迂迴包圍、機動主宰戰場、集中優勢兵力於決戰方面等。[109]不過，雖然此時預料日軍將發動迂迴攻勢的推測正確，但對進攻方向的判斷卻完全相反。

108 《林蔚報告書第一冊》，頁 35-36。
109 〈林蔚日記〉，1941 年 5 月 3 日。

日軍的動向爲何？於此有必要略爲考察。日軍進攻緬南時，即規劃繼續向北進攻，受命的第十五軍進攻方向概分爲西、中、東三路，西路第三十三師團沿伊洛瓦底江進攻仁安羌附近地區；中路第五十五師團沿仰光往北向同古、曼德勒進攻；東路第五十六師團經仰光至同古經毛奇向棠吉（東枝）前進，再向北方或東北方迂迴至國軍後方，斷國軍退路；另有第十八師團，係作爲第二線兵團，之後也將投入棠吉以北或東北，向東路迂迴國軍後方。[110]

對於日軍動態，林蔚判斷將增兵至三到四個師，最後目標爲緬北八莫、密支那與臘戍確屬正確，但判斷日軍主力將沿伊洛瓦底江從西路迂迴則屬錯誤。林蔚所以這樣判斷，係因深感英軍戰力薄弱、戰意消沉，明顯在保存實力，並未逐次抵抗爭取時間，只在覓取安全撤退之方法，故對英軍所在之西路伊洛瓦底江方面最不放心，遂相對忽視東路部署。林蔚事後自承：「未建議抽調第六軍之能戰部隊一師以上位置於毛奇地區，則實爲後來之實際錯誤。」[111]

其實，林蔚並非完全沒有注意到東路毛奇方面的布防。3 月 18 日馬丁於會報上提出，英緬第一師有一旅（第十三旅）亟需從毛奇調赴普羅美方面，要求國軍迅速接防。林蔚以毛奇地區原在國軍作戰地境以內，當即同意。同日，林蔚專函在瓢背的杜聿明，請第五軍派遣一個補充團至毛奇，利用地形佔領陣地，之後再增調一個補充團至毛奇、羅衣攻間地區。[112]

這是補強國軍東路的一個機會。林蔚雖認爲日軍主力在西路，爲保險起見，仍指導杜聿明增調兩團兵力駐守此地。然而，杜聿明以如此部署，第五軍各部間距離過大，只能膠著守備於遼闊戰場，全無機動能力，遂未遵照林蔚的指導。此時杜已開始執行遠征軍第一路副司令長官職權，他直接聯繫第六軍甘麗初軍長，劃定兩軍作戰地境，將毛奇、羅衣攻、棠吉公路歸第六軍守備。指揮既定，再打電話向林蔚報備。[113]

110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ビルマ攻略作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頁 72-77、184-187。
111 《林蔚報告書第一冊》，頁 36-37、39-40。
112 《林蔚報告書第一冊》，頁 49-50。
113 〈第五軍緬甸戰役戰鬥詳報〉（1942 年 3 月-8 月），收入《滇緬抗戰檔案（上冊）》，頁 86。

對於杜聿明的部署，林蔚沒有堅持己見，他調動第六軍加強東路毛奇方面，於 3 月 19 日直接與軍長甘麗初面商，將暫五十五師現駐羅衣攻之第一團（欠一營）輸送至毛奇接替英軍防務，另外再派一營進駐羅衣攻，以支援毛奇及保拉克之作戰；暫五十五師主力則移駐棠吉，仍爲第六軍之預備隊，同時準備策應第五軍之作戰。[114]如此部署，則毛奇只有不到一團的兵力駐守。林蔚雖知毛奇方面的戰略地位重要，有意加強防禦，但因判斷日軍主攻方向在西路，國軍力量有限，遂未於此投入充分兵力。

另有一事影響參謀團對部署的判斷。參謀團於日軍少尉畿部一往遺體檢獲地圖、日記及重要文件，獲悉日軍作戰規劃，惟內容完全隱匿第五十六師團即將經過毛奇，從東路大迂迴至國軍後方的企圖。[115]

是以，林蔚受英軍戰志薄弱影響，較爲考慮西路的防務，認爲伊洛瓦底江方面非常危險，而毛奇方面有自己的部隊可以倚賴，且又未獲相關敵軍情報，[116]遂疏於防範，一再失去加強該地防務的機會。他致函蔣中正明確表示：「竊以此後戰局其重心或不在東，而將傾向於西路。」[117]

第一次緬甸戰役進展非常快，自日軍於 3 月中旬從緬南向北發動攻勢，至國軍 5 月初全面撤退，僅僅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戰前的戰略、戰術規劃與部署因此相對重要，這個過程先是由蔣中正親赴前線立下戰略，蔣離去後由參謀團代蔣處置，規劃整個戰術布局，並隨時向蔣報告戰情。林蔚、蕭毅肅等藉由侯騰、中英軍事聯席會報與英軍聯繫，籌劃構思整體部署。蔣中正固然高度重視緬戰，許多細節仍須倚賴參謀團全心投入研究籌劃。尤其，蔣在重慶大後方的地圖未若在前線的參謀團細緻，一開始對東路毛奇方面的重要性並未留意，僅

114 〈第五軍緬甸戰役戰鬥詳報〉（1942 年 3 月-8 月），收入《滇緬抗戰檔案（上冊）》，頁 87。

115 《林蔚報告書第一冊》，頁 52-53。〈李漢萍，緬戰雜感〉，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 B5018230601/0026/152.1/3390，「梁氏兄弟捐贈抗戰名將戰史資料」。李漢萍係第五軍參謀處長。

116 《林蔚報告書第二冊（一）》，頁 40-41。

117 〈林蔚致蔣中正函〉（1942 年 3 月 31 日），《蔣檔》，典藏號 002-080103-00060-004，「盟軍聯合作戰（五）」。

是循著參謀團的規劃，參謀團於東西兩路的部署與建議之影響力更爲突顯。[118]

（二）同古緒戰：參謀團與史迪威的折衝

史迪威是中日戰爭時的爭議人物，一般論述第一次緬甸戰役前線戰事之時，多會關注史迪威的動態。其實，史迪威進入戰場的時間較晚，他與他的參謀人員於 1942 年 2 月中旬方離開美國，乘飛機至加勒比海，再經南美橫跨大西洋到西非，然後經開羅、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到印度德里、印尼。在印度、印尼，史迪威與英國高階將領交流，此間日軍攻陷新加坡，擄獲 8 萬英軍，隨後日軍又攻陷仰光。直至 3 月初，史迪威方與蔣中正在臘戍短暫會面，3 月中旬才抵達前線，手下參謀人員還十分不足。[119]可以想見，史迪威對國軍實況並不熟悉。

史迪威於 3 月 11 日自重慶飛緬甸臘戍甫安頓，次日即赴林蔚的參謀團本部熟悉環境，與英軍溝通，開始執行指揮權。在檢查作戰計畫、與林蔚等長談之後，史迪威發現部署不妥，於 17 日飛返重慶。[120]在重慶，史迪威與蔣中正論辯，他們爭論點不是前文提到東、西路防禦重心的問題，而是應固守緬中或進兵緬南的保守抑進取之戰略。

原先蔣中正提示參謀團的戰略規劃，是縱深配備，主力集結緬中曼德勒，掩護後方重鎮臘戍與密支那以維中印交通，僅以一個師（第二００師）在緬南同古，肩負拒退敵人、掩護主力集中之任務，再視情況發動反攻。[121]史迪威則

---

118 蔣中正，〈國軍入緬作戰經過和決心與我全軍對世界戰局演變應有之認識和準備〉（1942 年 5 月 3 日），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9，頁 85-87。

119 1942 年 3 月 3 日史迪威抵臘戍，在此見到蔣中正一面，已而赴重慶與蔣長談，3 月 11 日獲蔣保證賦予充分指揮權，即赴緬甸前線。也就是從抵達戰場到開始指揮作戰，不到 10 天，可見時間之迫促。Frank McLynn, *The Burma Campaign: Disaster into Triumph, 1942-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50, 54-55.

120 *Joseph W. Stilwell Diaries* [Hereafter, *JWS Diaries*],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March 12-15, 1942.

121 蔣中正派兵入緬初期目的，爲支援英軍固守仰光這個具關鍵戰略價值的出海口。仰光失陷之後，蔣的指導趨於保守，以保衛增援與給養較便利的緬中曼德勒爲主，不欲國軍大舉南進。〈蔣中正接見史迪威談話紀錄〉（1942 年 3 月 9、10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19-014~015，「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

主張國軍應以三個師向緬南推進。蔣不以爲然，向史迪威多方解釋固守緬中曼德勒的重要。史迪威最後提出折衷辦法，即部隊之配置遵照蔣指示之全盤計畫，惟戰鬥開始以後，敵軍行動將使我方不得不改變原來陣線，此時應由史迪威決定部署。蔣同意其意見，申言「在余所決定之計劃範圍以內，可照此辦理」。[122]

3 月 20 日，史迪威於重慶再次面見蔣中正確認戰略部署，[123]隨即自重慶飛臘戍，帶來蔣中正手令，內容爲國軍在同古、平滿納方面陣地之兵力，「應以現有者爲限」；同古必須死守，我軍決戰地區，「必在曼德勒附近」。對於史迪威的指揮，手令特別指示「對於史參謀長之命令，應絕對遵守」。[124]

次日，史迪威在臘戍依據蔣中正的指示，對遠征軍下達第一號作戰命令，開始執行其指揮權，將第二００師、第五軍直屬部隊及第六軍之暫五十五師主力，皆歸杜聿明指揮，擔任同古方面之作戰。第五軍之新二十二師，準備支援普羅美方面；第九十六師爲總預備隊，速開曼德勒附近，歸史迪威直接指揮。毛奇方面，仍依照參謀團原定計畫，派暫五十五師之一部接替英緬軍防務。史迪威進駐曼德勒東邊的梅苗，之後各部一切報告，均向梅苗及臘戍參謀團投遞。[125]此命令係參謀團依史迪威意旨代爲起草，由參謀團成員蕭毅肅親持令稿請史迪威簽署後發出，林蔚並且直接打電話給杜聿明，令其及早準備。[126]

史迪威的命令充分利用其臨機指揮權，額外將第五軍直屬部隊投入，偏離蔣規劃同古方面兵力「以現有者爲限」的指示。第五軍直屬部隊與一般軍級單

122 〈蔣中正接見史迪威談話紀錄〉（1942 年 3 月 19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19-026，「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 *The Stilwell Papers*, arr. and ed.Theodore H. White (New York: W. Sloane Associates, 1948), pp. 63-68.

123 〈蔣中正接見史迪威談話紀錄〉（1942 年 3 月 20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19-028，「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

124 〈林蔚致何應欽、徐永昌呈〉（1942 年 3 月 22 日），收入《滇緬抗戰檔案（上冊）》，頁 19-20。

125 「史迪威報告致中國遠征軍作戰命令」（1942 年 3 月 21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政府抗戰時期軍事檔案選輯（下冊）》（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頁 961-962。

126 *JWS Diaries*, March 22, 1942;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106. 〈林蔚致何應欽、徐永昌呈〉（1942 年 3 月 22 日），收入《滇緬抗戰檔案（上冊）》，頁 20。

位的直屬部隊不同，其編制特大，兵力佔全軍五分之二，有裝甲第一兵團、騎兵團、汽車兵團、工兵團、輜重兵團、戰防砲營、平射砲營等，裝甲部隊並含國軍少見的戰車部隊在內。[127]

林蔚對於史迪威變更蔣的部署，態度爲何？他沒有表示任何異議。所以如此，或因軍委會要員對於國軍是否挺進緬南本有爭議；[128]並且，蔣中正心中始終認爲日軍將北進攻打蘇聯，「決不能用如此大兵在緬也」。[129]因此，林蔚作爲蔣中正與軍委會在緬甸現地的代表，於統帥部意見分歧的情況下，沒有強硬阻止史迪威的必要。

3 月 21 日，第一次緬甸戰役緒戰同古戰鬥打響，戰況緊迫。參謀團本該提供史迪威參謀作業支援，與史之間的聯絡卻不甚暢通。史迪威希望參謀團移駐他所在的梅苗，林蔚認爲臘戍是入緬基地，不建議全部移動。蔣同意林蔚的建議，留參謀團在臘戍「以便通訊」。[130]至於遠征軍主力杜聿明向參謀團的聯繫，是在同古戰鬥開始後才送出 3 月 18 日擬訂的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部作戰計畫予參謀團，已不及實施。於是，遠征軍沒有依蔣的規劃集中兵力於緬中曼德勒周圍，也沒有如史迪威要求將兵力集中於緬南同古，林蔚事後乃謂同古之戰「既非掩護主力集中，又非與敵決戰，其結果等於浪戰也」。[131]

---

127 孫建中，《國軍裝甲兵發展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頁 46-47；《林蔚報告書第一冊》，頁 59、61。

128 當時軍委會參與機宜者，概可分爲進取（主力進向緬南）、保守（守住曼德勒以北），前者如參謀總長何應欽、軍令部次長劉斐，後者如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軍令部長徐永昌。劉斐判斷日軍主力在緬南僅兩個師，不敢與南進國軍力戰，若敵增兵，國軍可相機北撤，設此時日軍攻潰英軍，奪取油田，國軍豈非坐致失敗，故倡前進緬南。何應欽同意劉斐的意見，認爲日軍不敢深入，國軍急進守住緬南現有地區最爲有利，因再一個月即達該地雨季。白崇禧認爲該方面盟軍無制空權，前進不利，之後撤退更難爲戰。徐永昌則主張待第五軍集結，視敵情再定該軍南進與否。《徐永昌日記》，冊 6，1942 年 3 月 18、20 日，頁 350-353。至於蔣中正，徘徊於進取與保守之間，他以爲入緬部隊不宜分散，但普羅美方面英軍無力，不能不增援，否則引起英、美惡感，復判斷「氣候漸變，再過半月，敵必不敢北攻，若敵果北攻，則其在英軍方面，必派一部來攻，我能以主力先擊潰其一部，是亦一策也。」〈蔣中正日記〉，1942 年 3 月 18 日。

129 〈蔣中正日記〉，1942 年 3 月 18 日、5 月 2 日「上星期反省錄」；周美華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 48，頁 446。

130 〈林蔚致蔣介石函〉（1942 年 3 月 24 日），收入《滇緬抗戰檔案（上冊）》，頁 23-24。

131 《林蔚報告書第一冊》，頁 60。

同古戰況雖然不利，史迪威仍決心於此擊潰來攻之敵，積極調派部隊集中同古，其間卻感到重重阻撓。他令第六軍派暫五十五師主力開至瓢背參加同古戰鬥，第六軍軍長甘麗初認爲不妥，應該將暫五十五師做爲該軍之總預備隊，甘不是跟史迪威溝通，而是函呈參謀團請示。[132]史迪威又將原配置支援普羅美方面的新二十二師轉同古參加決戰。28 日上午，史迪威到較前線的瓢背，繼續下令增援部隊與死守同古的第二００師協力夾擊敵人。[133]

史迪威感到杜聿明故意拖延進攻，杜有千百種理由藉口無法發動攻擊，例如稱敵軍有 105 門火砲，我軍只有 75 門，或言火車總是出軌等等。林蔚到瓢背史迪威的司令部了解戰況，發現史迪威將用強硬手段迫使新二十二師發動進攻，爲免涉入紛爭，沒有跟史迪威打招呼便返回後方。史迪威察覺後，立即追過去，於 28 日凌晨在梅苗找到林蔚，要求應該是「史迪威的參謀長」的林蔚接受他的意見，並施壓林蔚用林的名義向杜聿明傳達命令。林蔚表示同史迪威絕對一致，將命令發了出去。[134]

表面上，林蔚尊重史迪威的指揮權，其實他與蔣中正不斷聯繫，不贊同繼續投注兵力，請蔣中正「嚴令避免增兵」。[135]蔣的看法一向謹愼，手令林蔚轉史迪威、杜聿明兵力勿逐次轉用，應待部隊集中後再出擊。[136]於是，杜聿明與新二十二師師長廖耀湘遵從林蔚所轉蔣的指示，並考量運輸、兵力尚未集中等因素，未向同古急進增援。[137]

---

132 該師後來因運輸遲滯未能到達同古戰場。《林蔚報告書第二冊（一）》，頁 13、27。

133 *JWS Diaries*, March 28, 1942.

134 *The Stilwell Papers*, pp. 74-79.

135 〈林蔚致蔣中正電〉（1942 年 3 月 28 日），《蔣檔》，典藏號 002-080103-00060-004，「盟軍聯合作戰（五）」。

136 〈林蔚與蔣介石等來往電〉（1942 年 3 月 27 日）、〈林蔚致蔣介石等電〉（1942 年 3 月 28 日），收入《滇緬抗戰檔案（上冊）》，頁 28、30-31。

137 *JWS Diaries*, March 29-30, 1942. 林蔚於 3 月 30 日致蔣一信函，詳述他在同古戰鬥的作戰指導與考量，從中可見其與杜聿明相約，未遵照史迪威即刻進攻的命令。〈林蔚致蔣中正函〉（1942 年 3 月 30 日），《蔣檔》，典藏號 002-080103-00060-004，「盟軍聯合作戰（五）」。

援軍支援遲緩，反攻無效，受日軍猛擊的第二００師於 28 日夜間放棄陣地撤退，國軍在緬甸戰役的第一場戰鬥於焉結束。[138]

（三）越級指揮的問題

由同古戰鬥的過程中，可見參謀團在緬始終參與機宜，作爲軍委會與前線的中間機構承上啓下，監督遠征軍作戰，與史迪威協調，與杜聿明密切研究戰情，並且承擔與英軍聯繫之責。林蔚與蔣中正／軍令部電文往返頻繁，以統帥部的戰略爲圭臬，對第一線戰術部署進行指導。遠征軍各部對參謀團的指導，有的付諸實行，有的則僅作參考。至於林蔚與史迪威之間的協調，當史迪威往前線指揮時，分處兩地，較爲隔絕。其實史迪威爲了獲得指揮自由，鮮少向蔣中正通報戰況，[139]更不用說與參謀團密切溝通。

越級指揮是討論蔣中正軍事指揮時常提到的問題，這牽涉到指揮權。史迪威人還在美國，就亟欲取得中國戰場的指揮權，[140]在同古戰鬥中雖獲蔣中正授予指揮權，卻感蔣的越級指揮讓他喪失權力，爲此激烈批評，大表不滿。其認爲蔣中正越級阻撓第二十二師之增援，使該師增援遲緩，造成同古之敗，於是在同古戰鬥告一段落後，飛重慶面見蔣以去就力爭。蔣中正答應處理史迪威的不滿，任命羅卓英爲新任司令長官聽從史迪威的命令，並親赴緬甸聲明賦予史迪威全權。[141]

事實上，在戰役初期，蔣的確多次寫信給史迪威指示戰局，但制度上的「越級指揮」很少發生。第二００師師長戴安瀾曾於 3 月 15 日致電蔣中正報告戰情，蔣遲至 25 日才復電，明確指示：「嗣後凡有請求應逕呈軍部，因此間無法遙制也。」[142]3 月 28 日，蔣再度申令，在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部未組織

138 〈林蔚致蔣介石等電〉（1942 年 3 月 28-30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中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頁 1440；《林蔚報告書第三冊》，頁 17-18。

139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頁 105。

140 *JWS Diaries*, January 16, 1942.

141 *The Stilwell Papers*, pp. 71-81；〈蔣中正日記〉，1942 年 4 月 4 日「上星期反省錄」。

142 〈戴安瀾與蔣介石來往密電〉（1942 年 3 月 15 日-25 日），收入畢春富編選，〈中國遠征軍緬甸作戰未刊文電〉，《民國檔案》，1992 年第 2 期，頁 4-5。

就緒以前，緬甸戰場狀況應報臘戍參謀團林蔚核轉，特別緊要的狀況，軍長才可以直接呈報統帥部，「各部隊應按陣中勤務令之規定，不得越級呈報，以免重複紛亂」。[143]論者或謂這一時期，蔣準備賦予史迪威充分權力。[144]

然而，蔣中正並非眞正放手讓史迪威發揮，他其實對史迪威很不信任，自記：「美國軍官史蒂華〔史迪威〕不知緬英戰地實情，任英欺妄，更爲可慮；故日夕焦思，以期挽回萬一，不致爲英軍所誤耳。」[145]蔣藉著參謀團掌控全局，監視史迪威，避免其有過於出格的舉動。參謀團的指導建議或戰情報告，直接以航空郵件（代電）或電報送重慶軍委會，指導建議請求批准，戰情報告供軍委會掌握情勢，當中包括轉報所屬各軍的電報。參謀團幾乎每日都有函電，且往往不僅一封。蔣中正對參謀團的電報十分留意，要求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對於林蔚的函電「應即立呈，不得在〔侍從室〕第一處延擱」，[146]並手令軍令部長徐永昌每日夜與在臘戍的林蔚用無線電聯絡，[147]甚至還直接打電話給同在重慶的徐永昌，詢問林蔚有無回電。[148]爲了讓參謀團能充分掌握各軍狀況以便轉報，蔣手令林蔚須與杜聿明、甘麗初兩軍長每日規定時間至少通報兩次，並派專員負責監督通信業務之實施。[149]參謀團的電報若過於簡略，會造成蔣的緊張，他曾去電林蔚詢問爲何來電不提戰況，「報告含糊，令人憂悶」；[150]參謀團若沒有按時上報，也會造成蔣的憂慮，他曾去電林蔚：「二日來未接前線戰況之報告，甚念；今晚務將前線情況詳報爲要。」[151]

143 〈蔣介石致徐永昌林蔚代電〉（1942 年 3 月 28 日），收入《滇緬抗戰檔案（上冊）》，頁 29。
144 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介石、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頁 108。
145 〈蔣中正日記〉，1942 年 3 月 21 日「上星期反省錄」。
146 〈蔣中正致林蔚手令〉（1942 年 3 月 9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19-012，「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
147 〈蔣中正致徐永昌手令〉（1942 年 3 月 7 日），《蔣檔》，典藏號 002-010300-00047-027，「籌筆——抗戰時期（四十七）」。
148 《徐永昌日記》，冊 6，1942 年 3 月 31 日，頁 362。
149 〈第五軍緬甸戰役戰鬥詳報〉（1942 年 3 月-8 月），收入《滇緬抗戰檔案（上冊）》，頁 84。
150 〈蔣中正致林蔚手令〉（1942 年 4 月 11 日），《蔣檔》，典藏號 002-010300-00047-042，「籌筆——抗戰時期（四十七）」。
151 〈蔣中正致林蔚手令〉（1942 年 4 月 14 日），《蔣檔》，典藏號 002-070200-00014-073，「交擬稿件——民國三十一年三月至民國三十一年六月」。

蔣對前線若有所指示，往往逕電林蔚處置，或藉林蔚轉給史迪威及各軍長。以 3 月 27 日同古失陷前蔣的一則手令來說，起首便撰「最急　臘戍或美苗轉　林次長」（最急電，發到臘戍或梅苗的通訊單位轉給林蔚），接著請林蔚轉史迪威、杜聿明，告以若情勢不急，應待兵力集中後再出擊，切忌逐漸使用部隊。[152]同日，林蔚致軍委會一航件，報告軍隊爲輸送所困，請示是否仍繼續在同古附近攻擊。蔣中正立即答覆如果同古完全失陷，前方情勢反攻並無把握，即在平滿納附近相機決戰（感亥電）。28 日，林蔚又致電軍委會，除報告戰況，並且提到如預期不能克敵，請蔣中正嚴令避免繼續增兵，其意在暗示史迪威太過積極，恐致不斷增兵而不可救（儉巳電）。[153]這兩則電文，具體呈現林蔚頻繁報告與請示，使蔣得以掌握全局並在復函中指導戰局。其實，每當重慶往臘戍的飛機起飛前，蔣往往書寫一、兩千字以軍郵寄給林蔚，[154]某晚他爲了「寫蔚文函」，甚至花了約二個半小時的時間。[155]

史迪威以蔣越級指揮遭致同古之敗而請辭，此舉讓蔣深感意外，愼重答覆史迪威說林蔚將被解職，[156]一度規劃「羅卓英入緬指揮，令林回滇，使史蒂華不直接指揮杜聿明，以免日後再起誤會」。[157]此事波及林蔚，且蔣明確向史迪威說明將以羅卓英替換林蔚，[158]羅、林兩人對舉，可見林在指揮鏈中的確有著近似司令長官的權力。

後來羅卓英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作爲史迪威與各部的協調者，史不必與各軍長直接接觸，俾保持雙方之間的好感，羅督責各軍切實執行史之命令，蔣

152 〈蔣中正致林蔚手令〉（1942 年 3 月 27 日），《蔣檔》，典藏號 002-010300-00047-033，「籌筆——抗戰時期（四十七）」。
153 《徐永昌日記》，冊 6，1942 年 3 月 27、29 日，頁 359、361。
154 〈蔣中正接見史迪威談話紀錄〉（1942 年 4 月 2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19-041，「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
155 〈蔣中正日記〉，1942 年 3 月 29 日。
156 *JWS Diaries*, April 2, 1942.
157 〈蔣中正日記〉，1942 年 4 月 1、4 日。
158 〈蔣中正接見史迪威談話紀錄〉（1942 年 4 月 2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19-041，「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

並重申給予史迪威全權。[159]派任羅卓英係爲安撫史迪威，以羅替代林蔚並隔開杜聿明，而羅本來便是規劃中的司令長官人選，先前係以杜聿明代理，此時剛好讓羅實任。[160]

林蔚並未馬上解職回滇，因爲蔣中正向史迪威表示，要讓林蔚留緬一、二星期，俾將當地現局向羅卓英一一解釋使其熟習，是後林即當返滇。[161]惟就在這一、二個星期間，戰局益趨複雜，看來羅尚未能「熟習」現局，而隨著戰事趨緊，蔣中正更爲需要林蔚的工作，返滇之事便未再提及。如是則羅卓英本該取代林蔚的聯繫與指導工作，並未能落實。只要林蔚領導的參謀團存在，且蔣中正對其運用依舊，羅卓英派任前後本質並無多大差異。派任前係以杜聿明代任司令長官，派任後以羅卓英實任，體系上前後任司令長官皆具指揮權並無二致，但既然多了一個人，指揮系統反而更顯疊床架屋。

受到史迪威的責難，參謀團一度調整命令與情報傳遞系統，即「關於每日戰報，上下午共三四次，此後自四月三日起，均報軍令部，遵不逕報鈞座〔蔣〕」，「遇有特別重要者，自當另發專電」。[162]但戰情緊急之際，「特別重要者」就是很多。[163]蔣對參謀團的使用依舊，私下仍「寫蔚文函，指導緬戰甚詳」，[164]並曾嚴令「希將余十、十一、十二及十五日各函電指導要旨，詳討綜核後決定作戰方鍼，不可貽誤」。[165]

質言之，史迪威不滿的制度根源，在於蔣將其意圖直接「示意」參謀團，再藉由參謀團經轉「指導」前線，此過程並未直接「指揮」部隊；參謀團作爲

159 〈蔣中正接見史迪威談話紀錄〉（1942 年 4 月 2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19-041，「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

160 原定司令長官衛立煌未能到任，3 月 21 日蔣中正於日記預定「令羅赴緬甸指揮。」〈蔣中正日記〉，1942 年 3 月 21 日。

161 〈蔣中正接見史迪威談話紀錄〉（1942 年 4 月 2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19-041，「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

162 〈林蔚致蔣中正報告〉（1942 年 4 月 2 日），《蔣檔》，典藏號 002-080103-00060-007，「盟軍聯合作戰（五）」。

163 參見《滇緬抗戰檔案（上冊）》，頁 34-47。

164 相關信函甚多，參見〈蔣中正日記〉，1942 年 4 月 11、12、25、26 日。

165 〈蔣中正致林蔚手令〉（1942 年 4 月 18 日），《蔣檔》，典藏號 002-010300-00047-047，「籌筆——抗戰時期（四十七）」。

軍委會的派出機構，代表蔣中正坐鎮指導，蔣直接示意參謀團並未越過史迪威而「越級」。不過如此制度，就是讓史迪威感到指揮權被架空而抱怨連連：「〔蔣的〕信件開始潮水般地湧來，給杜的、給林蔚的、給我的，每封信都發出指示，我看到的信從未超過半數。」[166]

史迪威的批評並非沒有道理，蔣中正固然「示意」參謀團，由於其權威之崇高，「示意」就是被視爲「命令」，「指導」就是被當成「指揮」，即便沒有眞正在體系上越級，其指導也顯得過於瑣細，偏離一般最高統帥部對下級原則性的指導。軍令部警覺林蔚與軍委會直接函電往來會遭批評爲「遙制」，巧妙地修改指示內容，「以詢問口吻示意蔚文次長」。[167]因此，爾後緬甸戰局大壞之際，軍令部次長劉斐私下批評蔣中正就如同下圍棋者，看到棋局已輸，便將棋子一扔，其意係指「過去對緬作戰，十之八、九由委員長『直接指揮』」，[168]就是指作戰指導與指揮混淆的狀況；制度上蔣中正沒有越級指揮之名，確有越級指揮之實。

深入探究，在緬軍事指揮體系所以如此，與國軍總體參謀制度架構息息相關。在中央統帥部，軍令部確屬指揮體系的一環，但其權威仍是來自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軍令部係蔣中正的軍令幕僚機關，軍令部指揮前線，是依據蔣中正大方向的指示所進行的細部指揮，以蔣的名義發出。[169]林蔚在前線爲參謀團主任，也是在現地的史迪威或羅卓英的幕僚，所有指導皆以羅卓英名義發出，但林蔚同時又身兼軍令部次長，也就是蔣中正在中央的軍令幕僚副職，直通蔣中正個人，等於在現地代表蔣中正。這樣身兼蔣中正幕僚與緬甸戰場指揮官幕僚的雙重身分，是參謀團在緬甸戰場指揮問題的制度性本由。

因此，史迪威一直提到國軍「體系」（system）的作用讓他喪失權力，[170]他的批評呈現部分事實。這是制度架構、蔣中正領導風格與指揮過細的映現，

166 *The Stilwell Papers*, p. 76.
167 《徐永昌日記》，冊 6，1942 年 3 月 30 日，頁 361。
168 《徐永昌日記》，冊 6，1942 年 4 月 30 日，頁 384-385。雙引號爲筆者所加。
169 蘇聖雄，《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 —— 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頁 68-84。
170 *The Stilwell Papers*, pp. 76, 79, 93.

也是國軍普遍的狀況，[171]第一次緬甸戰役亦難避免。於此脈絡下，參謀團以其在指揮鏈的地位和通信物質因素，在體系中居間發揮作用。與國軍協同作戰的英緬第一軍總司令史林姆（William J. Slim）[172]亦從旁注意到參謀團的作用，日後回憶到：

> 在臘戍的中國參謀團有一位林蔚將軍，他是委員長的直接代表，溫和地否認了所有作戰責任，但正如林蔚謙虛地說的那樣「施加了影響」。這種「影響力」使得中國陸軍指揮官除非通過林蔚，不然亞歷山大、史迪威、羅卓英的命令都不會執行。[173]

足見緬甸戰役國軍指揮權與指揮體系之中，林蔚的參謀團確屬不容忽視的一環，是理解戰役進行時越級指揮問題的一個關鍵。

（四）惠通橋之役：參謀團的撤退部署

1942 年 4 月 19 日，新三十八師第一一三團劉放吾的部隊增援西路，成功解救仁安羌的英軍部隊 7,000 人，是爲「仁安羌大捷」；[174]然而就在此時，日軍於東路發動猛攻。

先是，日軍第五十六師團由渡邊正夫中將指揮，乘船自仰光上陸，然後與第五十五師團協力進攻同古，攻陷同古後經過集結與準備，派先遣隊向東路進

---

171 國軍將領普遍有受蔣中正遙制無法施展之感。張瑞德，《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頁 354-369。林蔚對國軍如此狀況，早知不妥，緬戰前便曾檢討：「指揮系統不可過於混亂，不可過於干涉，否則指揮單位不勝其煩」，「一旦最高脫其樞紐或通信不靈時，各級均失其自信力，甚爲危險」；但他也知道這不容易，需要指揮官「涵養習慣」。〈林蔚日記〉，1941 年 10 月 2 日。

172 開戰後，英緬軍（總司令麥克萊，後易爲胡敦，最後爲亞歷山大）兵力有英緬第一師、英印第十七師、裝甲第七旅，並有砲兵、空軍等部隊，後來英緬軍總司令之下又組成英緬第一軍（總司令史林姆）。這些英國在緬部隊，又受英印軍總司令節制（總司令魏菲爾，一度出任美英荷澳盟軍總司令）。Alan Warren, *Burma, 1942: The Road from Rangoon to Mandalay*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pp. 35, 37, 49-53, 77, 148, 152, 164;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102.

173 William Slim, *Defeat into Victory: Battling Japan in Burma and India, 1942-1945*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2000), p. 17. 本書係史林姆戰爭回憶錄。

174 何世同，〈1942 年「仁安羌之戰」始末〉，《國防雜誌》，卷 32 期 2（2017 年 6 月），頁 1-48。

攻（故參謀團一度感到日軍運用於東路的兵力不大），然後集結大部隊於 4 月中旬突進。[175]

參謀團早已注意到東路的重要，戰前林蔚曾實地考察緬甸東路，[176]戰時嘗試補強，惟因種種考量所限，補強並不充分。蔣中正高度重視緬戰，同古戰鬥後的 4 月初再次親赴緬甸視察部署，這時他赫然發現重慶大後方的地圖並不精確，東路毛奇有路可通臘戍，遂耳提面命遠征軍注意東路棠吉之防禦。[177]然而受英軍撤退過快與日軍故布疑陣所羈，參謀團雖領受蔣的指示並早已對東路戰況有所關切，但始終未看得太重，加以道路狹小，兵力早已展開，一時不易集中，只能遷就先前的部署，日後林蔚乃自我檢討「不能不分任其咎。」[178]

其實，同古戰鬥後，蔣中正雖注意到東路部署薄弱的問題，他與參謀團主要仍將精力置於規劃部署中路的平滿納會戰。後來因爲西路英軍撤退不止，平滿納腹背受敵，會戰放棄。[179]參謀團與羅卓英、史迪威等繼續糾結於西路英軍的動向，亞歷山大續向國軍請求支援，威脅國軍若不同意，英軍將撤走。史迪威遂將自平滿納後撤至梅克提拉等地之國軍第二００師及新二十二師，改向西路喬克巴唐等地前進，爾後隨戰情發展，部署數度更異。[180]

175 〈ロイカウ、ヤメセン、エナンジヨンの線に向ふ前進並に会戦計画の策定〉，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緬甸作戰記錄 · 第 1 期》，檔號 C14060381000；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ビルマ攻略作戦》，頁 295-299、329-334、368-370。

176 1941 年 3 月 5 日，林蔚領導緬印馬軍事考察團一組，自同古向東抵景東，沿途考察緬甸東路，注意到同古以東「山高林密，比以西地區尤甚，兵隊行動愈見困難，除公路外，惟步兵尚可活動，其他兵種難以使用」。〈林蔚日記〉，1941 年 3 月 5 日。

177 〈蔣中正在梅苗接見史迪威談話紀錄〉（1942 年 4 月 8 日）、〈蔣中正致羅卓英杜聿明轉史迪威電〉（1942 年 4 月 8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19-043~044，「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蔣中正，〈國軍入緬作戰經過和決心與我全軍對世界戰局演變應有之認識和準備〉（1942 年 5 月 3 日），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9，頁 85-87。

178 《林蔚報告書第二冊（二）》，頁 24-25；〈蔣中正日記〉，1942 年 4 月「本月反省錄」。

179 〈蔣中正日記〉，1942 年 4 月 18 日、18 日「上星期反省錄」。

180 〈林蔚致蔣中正函〉（1942 年 4 月 21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20-012，「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二）」；《林蔚報告書第二冊（二）》，頁 30、32-35。

被忽視的東路情勢急轉直下，羅衣攻激戰，參謀團立刻與羅卓英討論應對部署。[181]4 月 23 日，棠吉失陷，雷列姆陷入混亂狀態。援救東路的第二００師抵達棠吉西方，隨即展開反攻，25 日克復。[182]棠吉雖然奪回，東路日軍主力仍繼續自雷列姆沿公路向北前進，逼近臘戍。[183]

林蔚與參謀團駐紮的臘戍，是入緬國軍後勤根據地。日軍東路大迂迴的目的就是此處，若被奪佔，遠征軍將失後方基地，且全軍主要退路將被遮斷。遠征軍主力部署於前線，於此重要後方，並未衛戍足夠兵力。負責遠征軍指揮的史迪威、羅卓英等皆在遠方，參謀團遂逕自權宜處置臘戍防務，調遣附近部隊回援。[184]

蕭毅肅向林蔚建議，參謀團必須不失時機，在日軍未控制滇緬路門戶畹町以前退回國境，部署逐次抵抗，爭取時間阻止日軍。林表示同意，原來具指導地位的參謀團，遂直接指揮部署。林與曼德勒方面的杜聿明通電話，令其將汽車部隊先撤回國內，主力向緬北逐次轉移，又令新到緬甸的第六十六軍（軍長張軫）在臘戍一線布防阻敵入滇。參謀團在臘戍和第六十六軍高級將領聚會，做出防衛相關指示後，於 4 月 29 日下午乘車沿滇緬公路經畹町撤回滇西，同時下令炸毀臘戍北方之鐵橋，5 月 5 日撤抵保山。[185]

4 月 29 日，日軍第五十六師團攻陷臘戍，隨即沿滇緬路向雲南怒江一線追擊。[186]蔣中正給參謀團大量文電指揮部署國門防禦，在感到各部支援遲緩之後，手令林蔚：「以後凡在滇西各部，如有不聽調遣或擅自撤退者，應由參謀團代行本委員長職權，照連坐法就地將其負責之主管官立行軍法從事。」[187]又

181 《林蔚報告書第二冊（二）》，頁 38-39。
182 《徐永昌日記》，冊 6，1942 年 4 月 24-26 日，頁 377-380。
18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ビルマ攻略作戦》，頁 373-377。
184 《林蔚報告書第二冊（二）》，頁 41。
185 《徐永昌日記》，冊 6，1942 年 4 月 29 日，頁 383；沈定，〈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抗戰〉，收入《遠征印緬抗戰》，頁 158；《林蔚報告書第二冊（二）》，頁 59。
18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ビルマ攻略作戦》，頁 378、389-390。
187 〈蔣中正致林蔚手令〉（1942 年 5 月 2 日），《蔣檔》，典藏號 002-010300-00048-003，「籌筆──抗戰時期（四十八）」。

爲求雲南防禦，令林蔚與昆明行營主任龍雲每日通電話與電報聯絡。蔣迫切關注戰況，當參謀團因向後方轉移沒有回報，蔣急令林蔚立復本日戰況。[188]

日軍進擊迅速，攻入雲南邊境，連下畹町、遮放、芒市、龍陵、騰衝，前進至怒江上的惠通橋。[189]惠通橋是橫跨怒江天險的鋼索吊橋，戰略地位重要，若爲日軍奪佔，將成日後日軍侵入雲南的重要途徑，整個中國西南根據地將爲之動搖。參謀團撤回雲南，搶先趕到惠通橋，在高級參謀、工兵指揮官馬崇六的指揮下，立刻將橋炸斷。蕭毅肅以軍委會的名義，集合已過橋的第六十六軍官兵，臨時編成連、排，指定團長、營長充任連、排長，於惠通橋邊高山上設立據點，構築掩體，以防日軍搶渡。[190]日軍由橋之上下游徒涉強行過河，與國軍戰鬥，國軍第三十六師宋希濂部趕到，經激戰將日軍擊退，兩軍遂隔河對峙。[191]戰況緊迫之際，林蔚不斷向蔣中正彙報，並建議阻敵戰術，請蔣迅予裁奪施行。[192]蔣頗滿意林蔚炸毀橋樑的臨機處置。[193]

參謀團撤至保山，遠征軍各路也陸續撤退。5 月 7 日，蔣中正電參謀團轉史迪威、羅卓英，令遠征軍全部向緬北密支那、片馬撤退。[194]參謀團當即轉發，並逕轉杜聿明。杜聿明隨即回報史迪威與羅卓英已徒步西撤，杜派參謀長追趕未及，將遵令繼續北進。蔣中正持續指示遠征軍關於滇西防禦和反攻龍陵、騰

188 〈蔣中正致林蔚手令〉（1942 年 5 月 2、7 日），《蔣檔》，典藏號 002-010300-00048-005、041，「籌筆——抗戰時期（四十八）」。

189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ビルマ攻略作戦》，頁 416-417。

190 沈定，〈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抗戰〉，收入《遠征印緬抗戰》，頁 161-162。

191 〈林蔚致蔣中正電〉（1942 年 5 月 6、7 日），《蔣檔》，典藏號 002-090105-00007-187、188，「遠征入緬（二）」；〈宋希濂致蔣中正電〉（1942 年 5 月 10 日），《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297-034，「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一年」。

192 〈林蔚致蔣中正電〉（1942 年 5 月 7 日），《蔣檔》，典藏號 002-090105-00008-057，「遠征入緬（三）」。

193 〈蔣中正日記〉，1942 年 5 月 6 日。其實，日軍進攻怒江的作戰目標是確保怒江西岸的戰果，並沒有要深入雲南，進攻昆明。〈4 月 2 日策定せる第 15 軍『マン』会戦計画〉，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昭和 16~20 年に至る期間に於ける東南アジア作戦に関する解答（昭和 22.12）》，檔號 C14020062700。不過，林蔚參謀團及時炸毀惠通橋，確能緩解國軍一時的緊張情勢。

194 〈蔣中正致林蔚手令〉（1942 年 5 月 7 日），《蔣檔》，典藏號 002-010300-00048-012，「籌筆——抗戰時期（四十八）」。

衝的部署，林蔚也不斷回報戰情及處置方法供蔣核奪，期間不乏臨機處置。[195]5月23日，國軍反攻騰衝、龍陵的部隊展開攻勢。迄29日，攻擊陷於停頓，31日停止攻擊，撤回攻擊部隊固守怒江，留置游擊部隊，滇緬路戰事遂轉變爲怒江對峙。[196]第一次緬甸戰役，至是告一段落。

林蔚遭此大敗，又逢母喪，「家事國事，哀憤欲絕」。[197]6月13日，參謀團於保山返抵昆明，林蔚在昆明協助遠征軍善後事宜，月底請喪假返桂林設奠，銷假後繼續承擔聯繫之責。[198]

五、結　論

第一次緬甸戰役擔任英緬軍總司令的亞歷山大，在戰後的報告分析國軍的指揮系統記述：

> 史迪威將軍指揮了中國第五、六軍，但他必須通過中國司令長官羅卓英將軍下達所有命令。此外，還有一個在委員長之下工作的聯絡官體系（a system of liaison officers），看來我本人、史迪威將軍或羅將軍發出的重大命令都不能執行，除非它們得到了委員長的核定。這些核定命令必須通過委員長的參謀團（Liaison Mission）獲得，其負責人是在臘戍的林蔚將軍，而林又在梅苗有一名前線聯絡官侯騰將軍。[199]

---

195 〈蔣中正致林蔚手令〉（1942年5月13日），《蔣檔》，典藏號002-010300-00048-026，「籌筆——抗戰時期（四十八）」；《林蔚報告書第二冊（二）》，頁60-75。

19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95-97。

197 《徐永昌日記》，冊6，1942年6月6日，頁419。

198 〈蔣中正致林蔚電〉（1942年6月26日），《蔣檔》，典藏號002-070200-00014-128，「交擬稿件——民國三十一年三月至民國三十一年六月」；〈林蔚致蔣中正電〉（1942年7月12日），《蔣檔》，典藏號002-090200-00076-143，「八年血債（五十二）」。

199 "Report by General the Honourable Sir Harold R. L. G. Alexander, K. C. B., C. S. I., D. S. O., M. C., on Operations in Burma from 5th March, 1942, to 20th May, 1942," *The London Gazette*, 11 March 1948, p. 1698.

亞歷山大接著對國軍指揮體系有所指責，認爲導致了執行關鍵行動時相當嚴重的拖延，但他也明確指出參謀團在戰役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只要作戰變動不要太大，參謀團的行政組織運作合理良善。[200]

這個參謀團，是國軍自黃埔建軍以來，參酌現代國家軍制漸次建立的機動組織，旨在作戰時貫徹統帥部意旨，聯繫中央與地方。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以後，參謀團制度賡續使用，在重要會戰中，統帥部派遣參謀團至地方指導監督。第一次緬甸戰役爲國軍首度遠出國門參與盟軍作戰，戰地遙遠、通訊不便，統帥部再次設置參謀團監督作戰進行，其主要工作，一爲指導，一爲聯繫。

作戰指導方面。蔣中正固然爲事必躬親的最高統帥，決定戰略並與前線通訊不斷，但緬甸戰場終究十分遙遠，現地仍須代表統帥部的機構做戰術指導或臨機處置，這便是參謀團的主要任務之一。從戰役初期到同古戰鬥、平滿納備戰、再到國軍撤退惠通橋之役，皆可見參謀團與前線將領聯繫頻繁，除了轉達蔣中正命令，也就細部部署提供蔣建議，並對前線進行作戰指導。其要者，如緬甸東路防禦，參謀團曾予注意，但受西路英軍戰志低落、日軍故布疑陣所羈，判斷日軍進攻重點在西路伊洛瓦底江方面，戰術指導遂偏重西路防衛，國軍東路設防益顯薄弱。此一判斷與日軍計畫完全相反，日軍爾後於東路組成快速部隊，突進穿越至整個遠征軍的後方基地臘戍，導致國軍後路被截，全面潰敗。當然，蔣中正也忽視了東路防衛，惟林蔚具現地考察經驗且擁有的地圖較重慶後方精細，知曉東路有道路可通臘戍，曾注意這個方面，蔣則完全不知該方面有路可通，故戰後特予反省檢討。因此，參謀團所見之戰場圖景，與蔣中正有所落差，參謀團不僅僅轉達蔣之作戰意旨而已，其戰略秉承蔣之方向，戰術則有一定自主性。另外就戰敗收拾來看，日軍自東路發動大迂迴攻勢，國軍陣線遭日軍突破，戰況急轉直下，參謀團極力挽救。遠征軍後方基地臘戍失陷，日軍攻抵國境，參謀團趕抵怒江天險惠通橋臨機布置，破壞鐵橋、調兵支援，穩

200 “Report by General the Honourable Sir Harold R. L. G. Alexander, K. C. B., C. S. I., D. S. O., M. C., on Operations in Burma from 5th March, 1942, to 20th May, 1942,” *The London Gazette*, 11 March 1948, pp. 1698, 1709-1710.

定了戰敗後的局面。凡此，皆可見參謀團在作戰指導扮演的角色。是役之失敗，論者多責以蔣中正、史迪威或英軍指揮官。他們的指揮固然關鍵，惟具指導地位的參謀團，其作爲亦與勝敗息息相關，誠如林蔚事後自省「〔戰敗〕責任不應由部隊長負之，而應由本團及在緬高級指揮機關共同負之也」。[201]

聯繫各方是參謀團另一重要任務。其聯繫對象有英軍、重慶統帥部、遠征軍長官部與各軍。對英軍的聯繫是參謀團與英軍建立中英軍事聯席會報，頻繁與英軍訊息交流，以助兩軍協同作戰，另外參謀團前身爲緬印馬軍事考察團，已建立對英聯繫管道，對緬甸在地情況、英緬軍戰力等，也有第一手考察，較國內熟悉現狀。對重慶統帥部的聯繫是參謀團對蔣中正或軍令部之往來，實際上參謀團本就是軍委會的派出機構，是一小型軍令部，因此統帥部傳令或獲取情報，最主要就是藉參謀團的聯繫。對長官部與各軍方面，下級戰報或統帥部的命令，係經參謀團上行下達，參謀團同時發揮遠征軍內橫向聯繫的作用。特別要指出，參謀團可以於聯繫方面發揮較大作用，與通信設備有關。遠征軍遠出異域，與國內的通訊極其重要，一般配發的通信設備無法直接與重慶方面聯絡，參謀團在臘戍 1,000 瓦特的第三報話臺是全緬國軍最大的電臺，功率較遠征軍長官部使用之 50 瓦特高出許多，只有航空函件與亦屬參謀團的侯騰擁有 100 瓦特的電臺，可作爲另外與重慶聯絡的管道。因此遠征軍長官或各軍欲與重慶直接聯繫，主要須藉參謀團，這不僅是因爲參謀團的地位，同時也因參謀團掌握最關鍵的溝通渠道，有物質因素的基礎。

指導與聯繫既爲參謀團的重要功能，林蔚與史迪威的關係自不可不談。蔣中正的越級指揮，令史迪威極其不滿，抱怨蔣的遙制導致國軍不聽使喚。表面上，蔣在整個戰役中，尤其戰事初期，尊重指揮體系，避免直接指揮第一線部隊；前線將領欲直接請示蔣中正，蔣多不回應，若有回應，則要求按層級回報。實則，蔣係透過參謀團掌控全局，他不與各軍直接聯繫，但極爲頻繁地透過參謀團獲知戰況與「示意」前線部署，參謀團再據以「指導」前線。就指揮系統

201 《林蔚報告書第二冊（二）》，頁 27。

而言，最高統帥「示意」中央派出機構的參謀團，並未越過史迪威直接「指揮」部隊，但史迪威就是感到自己被「體系」所限。史迪威的批評固然可從蔣中正領導風格、指揮過細來認識，而若從國軍的制度架構、指揮系統，尤其是參謀團的作用，便可理解史迪威感到的「體系」爲何，得以更完整認識戰役指揮時制度的作用。

若著重考察參謀團核心人物林蔚，可見他在整個戰役過程與統帥部的聯繫工作，得失參半。史迪威感到深受重慶方面的制約，從另一面來看，便是林蔚發揮了作用。惟其與英軍方面的聯繫，雖有補遠征軍出國作戰之種種後勤事宜，問題仍多，難說完善。至於指導工作，林蔚則顯力有未逮，其雖深知戰事緊急時消息斷絕，前線必本最高統帥所示之方針與任務，再考慮全般戰略戰術獨斷作戰，[202]然而他在遠征軍指導過程，關涉重要作戰指導時，考量繁多卻作爲消極。誠如其某次與蘇聯軍事總顧問福爾根（Кузьма́ Макси́мович Кача́нов）接觸後自省：「〔福爾根顧問〕對於戰略上著眼與余相同，而余所不及者，乃其率直自信之精神，此種精神爲軍事將領必須具備，余甚自愧之不如也。」[203]在規劃遠征軍戰事時，蔣中正亦曾批評：「蔚文最近消極，其精神甚疲乏，此本一膽小不能負責之人，近則似更無效用。人才之難，大才固不可多得，而求一小才，奉行惟命，終始如常者，亦不可得也。」[204]讀蔣之日記，可見他時常責罵愈兇、關愛愈厚，此批判不見得完全貶抑林蔚。其實蔣對林蔚優缺點觀察甚深：「在余左右時，指揮軍事效率頗強，惟不在余側時，彼恆不能當機立斷。」[205]或因此，當戰役善後告一段落，蔣便將林蔚調回重慶中央，出任侍

202　〈林蔚日記〉，1941 年 10 月 1 日。

203　〈林蔚日記〉，1941 年 2 月 1 日。

204　〈蔣中正日記〉，1942 年 2 月 28 日。徐永昌曾建議蔣中正以林蔚兼任陸軍大學教育長，蔣謂「其精神差」。此時蔣所以對林如此評價，部分原因或爲林顧念老母申請就養。《徐永昌日記》，冊 6，1942 年 1 月 26 日、3 月 22 日，頁 324、355。

205　〈蔣中正接見史迪威談話紀錄〉（1942 年 4 月 2 日），《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19-041，「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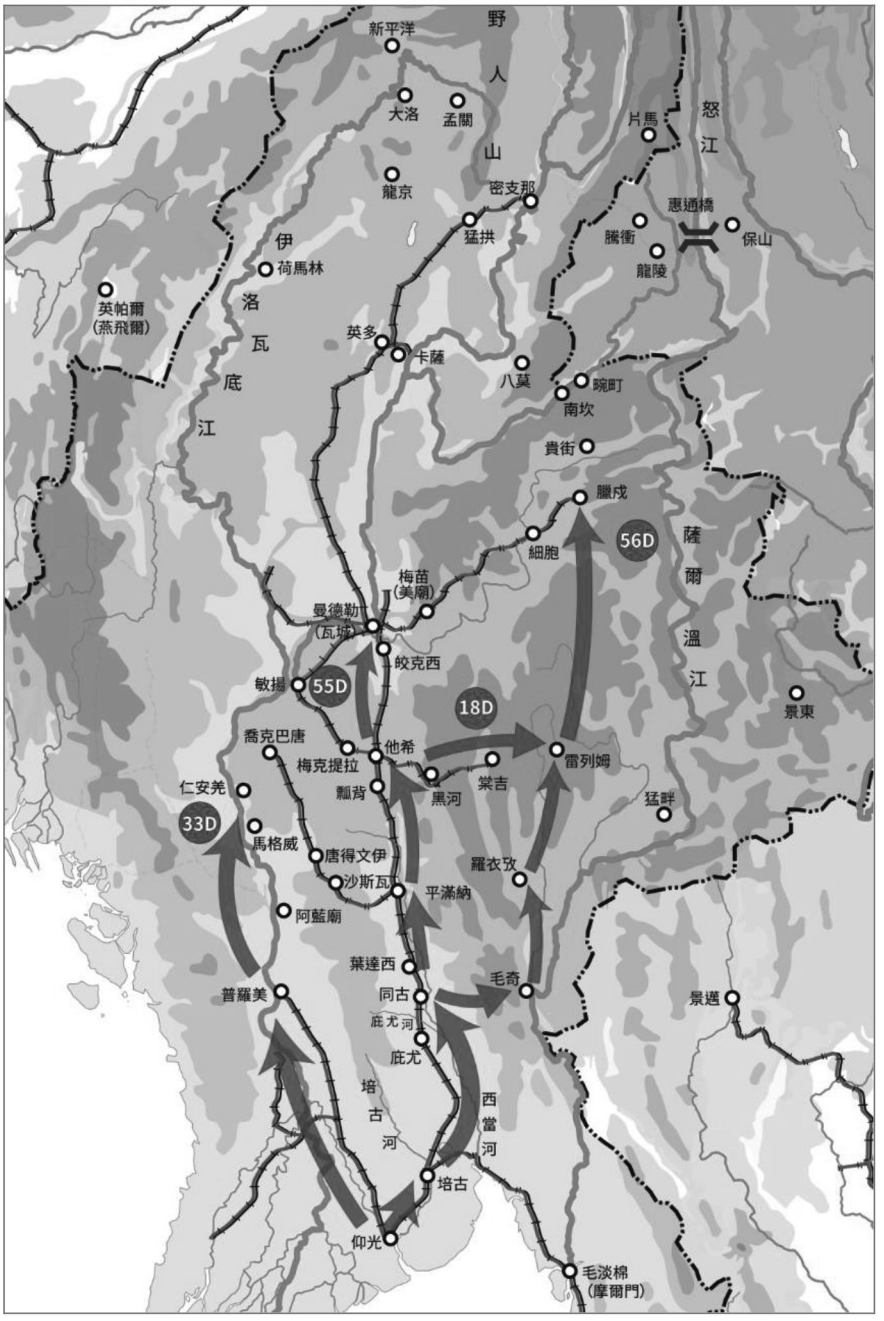
從室主任，近身從事參謀工作，將他置於所擅長的職位；[206]此舉復可見蔣對林蔚之信任，始終未墜。

最後，從運用參謀團的過程，亦得以映現蔣中正的領導統御特色。第二次世界大戰列強之戰爭運行，元首鮮少親自指揮前方作戰。美國總統羅斯福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信任甚專；日本天皇不過問作戰細節；雖如德國領袖希特勒（Adolf Hitler）嘗遙制前方，卻並未如蔣中正的每日數電或手令千字。此或爲蔣中正出身軍旅，自認作戰經驗豐富，視軍事爲自身權責，且具參謀長性格，故未能分清「最高統帥」與「戰地司令」之區別。

第一次緬甸戰役之後，蔣中正計劃第二次緬戰，仍在思考「反攻緬甸之統帥問題與參謀團之組織」，[207]也就是仍欲運用參謀團面對下一場惡戰。要之，參謀團是第一次緬甸戰役國軍的重要組成環節，其組織與運行具體展現了蔣中正的組織運用、領導統御特色，以及國軍參謀制度的發展與侷限。

206 〈林蔚人事登記片稿〉，《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入藏登錄號 129000098222A，「林蔚」。
207 〈蔣中正日記〉，1942 年 11 月 3 日。

附圖 1　第一次緬甸戰役概圖



資料來源：蘇聖雄主編，《林蔚文抗戰遠征日記（1942）》，頁300。

徵引書目

一、檔案

國史館藏檔案

《蔣中正總統文物》

「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一年」，典藏號 002-080200-00297-022。

「一般資料——民國三十年（三）」，典藏號 002-080200-00296-047、002-080200-00296-048、002-080200-00296-058。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八十九）」，典藏號 002-080200-00516-115。

「八年血債（五十二）」，典藏號 002-090200-00076-143。

「中央軍事機關人事（二）」，典藏號 002-080102-00018-007。

「交擬稿件——民國三十一年三月至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典藏號 002-070200-00014-073、002-070200-00014-128。

「交擬稿件——民國三十二年八月至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典藏號 002-070200-00019-017。

「全面抗戰（三）」，典藏號 002-080103-00036-005。

「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重要協商（一）」，典藏號 002-020300-00016-050。

「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典藏號 002-020300-00019-001、002-020300-00019-010、002-020300-00019-012、002-020300-00019-014、002-020300-00019-015、002-020300-00019-016、002-020300-00019-026、002-020300-00019-028、002-020300-00019-041、002-020300-00019-043、002-020300-00019-044。

「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二）」，典藏號 002-020300-00020-012、002-020300-00020-014、002-020300-00020-015、002-020300-00020-016。

「革命文獻——抗戰方略：後方部署」，典藏號 002-020300-00006-041、002-020300-00006-043、002-020300-00006-044、002-020300-00006-060、002-020300-00006-061。

「革命文獻——對英外交：一般交涉（二）」，典藏號 002-020300-00040-005。

「盟軍聯合作戰（五）」，典藏號 002-080103-00060-004、002-080103-00060-007。

「遠征入緬（二）」，典藏號 002-090105-00007-187、002-090105-00007-188、002-090105-00007-382。

「遠征入緬（三）」，典藏號 002-090105-00008-044、002-090105-00008-057、002-090105-00008-184。

「籌筆——抗戰時期（四十七）」，典藏號 002-010300-00047-027、002-010300-00047-033、002-010300-00047-042、002-010300-00047-047、002-010300-00047-052。

「籌筆——抗戰時期（四十八）」，典藏號 002-010300-00048-003、002-010300-00048-005、002-010300-00048-012、002-010300-00048-014、002-010300-00048-026。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

「林蔚」，入藏登錄號 129000098222A。

《國民政府》

「緬甸戰役得失評判」，典藏號 001-072620-00001-001、001-072620-00002-001、001-072620-00003-001、001-072620-00004-001。

《陳誠副總統文物》

「林蔚文抗戰日記節錄」，典藏號 008-010701-00001-001～008-010701-00001-012。

《閻錫山史料》

「全面抗戰南口會戰暨張垣失陷案（二）」，典藏號 116-010101-0118-062。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案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梁氏兄弟捐贈抗戰名將戰史資料」，檔號 B5018230601/0026/152.1/3390。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

《軍令部》

〈軍令部聯絡參謀派遣規則〉（1938 年 7 月），檔號七六九-2441。

〈工作報告〉（1942 年 10 月至 1943 年 10 月），檔號七六九-2481。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

〈4 月 2 日策定せる第 15 軍『マン』会戦計画〉，《緬甸作戰記錄 · 第 1 期》，檔號 C14020062700。

〈ロイカウ、ヤメセン、エナンジョンの線に向ふ前進並に会戦計画の策定〉，《昭和 16~20 年に至る期間に於ける東南アジア作戦に関する解答（昭和 22.12）》，檔號 C14060381000。

Foreign Office (F.O.),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Kingdom

Governor of Burma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Burma, 27 February 1941, F.O. 371/27611 [F1404/29/10].

Governor of Burma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Burma, 24 March 1941, F.O. 371/27611 [F2276/29/10].

Sir A. Clark Kerr to Mr. Eden, 20 January 1941, General Review by Sir Arthur Blackburn of Political Events in China during 1940, F.O. 371/27717 [F3782/3782/10].

Mr. N. G. Morrison to Mr. Harrison, 6 January 1942, Liaison with Chinese Forces, F.O. 371/31632 [F384/74/10].

Mr. Eden to Sir A. Blackburn (Chungking), 22 April 1941, F.O. 436/16158 [F3077/60/10].

Mr. Eden to Sir A. Clark Kerr (Shanghai), 24 March 1941, F.O. 436/16158 [F1846/523/G].

Burma Office Records, British Library

China: Assistance to China: Military Mission to Chungking, China, Under Maj-Gen L E Dennys Preparation of Mission (204 Military Mission) and Base Organisation in Burma Supply and Personnel, December 21, 1940 - February 26, 1943, Manuscript Number: IOR/M/3/1020.

二、史料彙編、報刊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中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政府抗戰時期軍事檔案選輯（下冊）》，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滇緬抗戰檔案（上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9。

周美華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 48，臺北：國史館，2011。

高明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 18，臺北：國史館，2005。

畢春富編選，〈中國遠征軍緬甸作戰未刊文電〉，《民國檔案》，1992 年第 2 期，頁 3-13。

賀國光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大事記》，上、下冊，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37。

葉惠芬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 46，臺北：國史館，2010。

The Stilwell Papers. Arranged and edited by Theodore H. White. New York: W. Sloane Associates, 1948.

The London Gazette, 1942,1948.

三、日記

〈蔣中正日記〉，1942-1943，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張發奎日記〉，1940，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藏。

〈黃旭初日記〉，1941，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冊 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蘇聖雄主編，《林蔚文抗戰遠征日記（1941）》，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

蘇聖雄主編，《林蔚文抗戰遠征日記（1942）》，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

Joseph W. Stilwell Diaries, 1942,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四、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遠征印緬抗戰》編審組編，《遠征印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頁 1-39。

沈定，〈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抗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遠征印緬抗戰》編審組編，《遠征印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頁 150-163。

林故上將治喪委員會編，《林故上將蔚文先生榮哀錄》，臺北：編者自印，1955。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0、18、19，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張朋園、林泉、張俊宏訪問紀錄，《於達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盛兆，〈滇緬抗日雜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遠征印緬抗戰》編審組編，《遠征印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頁 164-193。
雲鎮，〈懷念孫將軍〉，收入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編輯委員會，《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臺北：孫立人將軍紀念館籌備處，1992，頁 133-139。
劉惇昌，〈中國軍事考察團赴緬、印、馬考察概況〉，《貴州省黔西南州文史資料選輯》，輯 5，1985 年 9 月，頁 10-17。
Churchill, Winston S.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V: The Hinge of F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Slim, William. *Defeat into Victory: Battling Japan in Burma and India, 1942-1945*.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2000.

五、專著

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大東亜戦争》，東京：芙蓉書房，1998。
王錫恩，《無線電原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ビルマ攻略作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
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東京：原書房，1996。
范鳳源，《無線電報務員須知》，出版地不詳：空軍軍官學校，1934。
孫建中，《國軍裝甲兵發展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國防部編，《國軍軍語辭典（九十二年修訂本）》，臺北：國防部，2003。
張瑞德，《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
陸軍大學譯，《美國參謀業務》，出版地不詳：軍令部第三廳，1939。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
蘇聖雄，《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臺北：元華文創公司，2018。
Allen, Louis. *Burma: The Longest War, 1941-1945*. London: Phoenix Press, 2000.
Greenhalgh, Elizabeth. *Victory through Coalition: Britain and France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Herwig, H. Holger. *The Marne, 1914: The Opening of World War I and the Battl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9.

Hittle, James Donald. *The Military Staff: It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Harrisburg, Pa.: Military Service Division, The Stackpole Co., 1961.

Kirby, Stanley Woodburn, C. T. Addis, et al. *The War against Japan, Vol. II*.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58.

Lowe, Peter. *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Lyman, Robert. Slim, Master of War: Burma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Warfare. London: Constable, 2004.

McLynn, Frank. *The Burma Campaign: Disaster into Triumph, 1942-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Romanus, Charles F.,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53.

Van de Ven, Hans.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Curzon, 2003.

Warren, Alan. *Burma, 1942: The Road from Rangoon to Mandalay*.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六、論文及專文

何世同，〈1942 年「仁安羌之戰」始末〉，《國防雜誌》，卷 32 期 2，2017 年 6 月，頁 1-48。

張瑞德，〈化干戈爲玉帛：溝通型幕僚與民國政治〉，《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 40，2008 年 12 月，頁 85-100。

馮啓宏，〈花谿論英雄：侍從室第三處的人事工作析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7，2007 年 9 月，頁 119-164。

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介石、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頁 99-130。

葉銘，〈業務紐帶：淺析抗戰時期聯絡參謀與參謀視察制度〉，《民國檔案》，2020 年第 2 期，頁 106-115。

藤井元博，〈中国国民政府の対日戦略と軍事作戦――1942 年のビルマ戦を事例として〉，《戦史研究年報》，号 22，2019 年 3 月，頁 1-29。

Lough, Thomas S. "The Military Liaison Missions in Germany."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1:2 (June 1967), pp. 258-261.

Williams, Peter. "The Changing Face of Military Liaison."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 (PHP),* http://www.php.isn.ethz.ch/lory1.ethz.ch/collections/coll_brixmis/military_liaisonf287.html?navinfo=2775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British Army Review*, Autumn 2003; accessed May 15, 2020).

Key Link: Lin Wei and His General Staff Mission to Burma in the First Burma Campaign

Su Sheng-hsiung*

Abstract

Regarding the first Burma campaign in 1942, the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were very fruitful, which shows the importance it received. Among the narratives, Lin Wei and his General Staff Mission to Burma are often mentioned, but in-depth academic research has not yet been carried out. In fact, Lin Wei's General Staff Mission to Burma in Lashio, the British High Command in Maymyo, and the Chinese Expeditionary Forces First Command Headquarters in Pyawbwe, the three high-level military units are very close to each other, and they all play certain roles. This campaign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went abroad to fight. The battlefield was far away and communication was inconvenien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 set up the General Staff Mission to Burma to supervise the operations of the expeditionary army. Its main tasks were guidance and communication. Examining the work of the General Staff Mission to Burma,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Miss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in the first Burma campaign. Its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specifically demonstrated Chiang Kai-shek's leadership,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s staff system.

Keywords: Lin Wei, Chiang Kai-shek, Joseph W. Stilwell, General Staff Mission to Burma, Chinese Expeditionary Force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